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因公出國報告書
(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出席 2014 年「全球經濟論壇」
(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S)
出國報告

服務機關：國家發展委員會

姓名職稱：主任委員管中閔等 17 人

派赴國家：馬來西亞吉隆坡

出國期間：103 年 9 月 6 日至 9 月 9 日

報告日期：103 年 10 月 15 日

摘要

一、**大會時間及地點**：德國基爾(Kiel)世界經濟研究院與馬來西亞瑪拉工藝大學(University Teknologi MARA)於2014年9月6日至8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辦全球經濟論壇(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S)，本會管主任委員率相關同仁及產學界代表出席。

二、**參與目的**：本次參與「GES 2014」，除有助於我國規劃具前瞻性與國際視野之政策、與國際智庫及國際重要具影響力人士建立合作交流管道，以及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外，更可展現台灣具有解決全球性議題之能力，進一步爭取在台舉辦GES。

三、**GES之重要性**：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為國際知名智庫，自2008年開始，每年召開GES，邀請各國產、官、學及社會菁英，討論全球共同關注之經濟及社會環境等議題，共商解決全球問題之具體方案。

四、**大會主題與議題主軸**：本次會議與會者來自30餘國，超過600人。大會主題為「經濟重建 社會轉型」(Redefining Success)，議題主軸包括：

(一)邁向永續經濟(Towards Sustainable Economies)

(二)邁向公平社會(Towards Equitable Societies)

(三)邁向適當治理(Towards Adequate Governance)

五、參與「GES 2014」活動

(一)擔任主持人及與談人

1. 管主任委員應邀擔任本次會議開幕晚宴講題「未來的工作」(The future of jobs)之桌次主持人，就教育制度再改革、鼓勵終生學習、提供輔助勞工轉職的訓練課程、鼓勵企業有效率雇用在地人才，以及更彈性的工作方式等議題與各國與談人交換意見。

2. 鋁新科技丁廣欽董事長、工研院楊致行博士，分別應邀擔任「對超級大城市之智慧規劃」(Smart Urban Planning for Megacities)及「廢棄物處理及回收政策－創造價值」(Adventures in Waste and Recycling Policies－Creating Value)分場議題與談人。丁董事長以越南胡志明市富美興開發計畫為案例，說明投資基礎設施、創造就業與長期教育資源投入規劃。楊博士則針對台灣廢棄物回收運作方式，分享推動環保永續發展的執行經驗與成果。

(二)一對一晤談

1. 會議期間管主委並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oseph Stiglitz教授，以及

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日內瓦高等研究所(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麥肯錫中國分公司等機構與會代表，就台灣在區域經貿整合中扮演的角色及因應作為、產業可能的發展利基、建構新的競爭優勢、台灣加入區域整合、基本薪資的設定、縮短產學差距等議題交換意見，並探求未來合作的機會。

- 2.另與Kiel 研究院Snower院長就與新經濟思維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建立合作關係、與Kiel 研究院規劃近期合作計畫，以及雙方再次合作續辦「2015 GES台北研討會」(GES Taipei Workshop)等事宜進一步詳談，強化與國際智庫聯結。

(三)擔任分場主辦

- 1.本次GES大會由我國主辦之「培養創新能力以因應全球供應鏈調整之變化」(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分場議題，納入今年5月與Kiel 研究院共同在台主辦之以「以創新變革與創業精神邁向知識型經濟發展」(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oward Knowledge-based Economy)為題「2014 GES台北研討會」之豐碩成果。
- 2.由工研院杜紫宸主任擔任主持人，邀請日本一橋大學經濟研究所Reiko Aoki教授、韓國產業經貿研究院Do-Hoon Kim所長、中國科學院穆榮平所長及果實夥伴公司陳宏守董事長擔任與談人。
- 3.會中與談人提出許多獨到見解，諸如建置有助於人才迴圈、腦力循環(brain circulation)的雙邊合作計畫；新型態的全球供應鏈運作模式，讓世界各國及廠商必須學習如何與競爭對手建立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政府應依據各個產業的強弱項進行優劣分析，做為政策決策依據，並鼓勵企業走向海外市場，政府亦可採用減稅措施，鼓勵企業從事研發等。主持人與各與談人藉由擔任分場主辦展現台灣、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等東北亞代表性國家對於全球重要議題的解決能力。

目錄

壹、與會目的.....	4
貳、會議過程與紀要.....	5
一、開幕.....	5
二、開幕晚宴.....	10
三、一對一晤談.....	11
四、分場主辦.....	27
五、其他分場座談.....	32
六、閉幕.....	62
參、心得與建議.....	65
肆、附錄.....	68
一、團員名單.....	68
二、行程表.....	69
三、GES 2014 議程.....	74
四、GES 2014 各會議場次主政人員與出席/陪同人員.....	79
五、台灣主辦分場座談簡介.....	81
六、GES 2014 台灣與談人講稿與參考資料.....	94
七、「GES 2014」大會活動照片.....	103

壹、與會目的

一、與國際智庫建立合作交流管道

德國基爾(Kiel)世界經濟研究院為世界排名第 40 大智庫(2012 年)，每年舉辦全球經濟論壇(GES)，邀請各國產、官、學及公民社會精英，討論全球共同關注之經濟及社會環境等議題，並共商解決全球問題之具體方案。

二、建立人際網脈、規劃具前瞻性與國際視野之政策、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透過參加 GES，瞭解國際人士對各項重大國際議題的觀點與解決方案，有助於我國規劃具前瞻性與國際視野之政策，並可提升我國國際能見度。

三、展現台灣具有解決全球性議題之能力

透過參加 GES，並擔任「培養創新能力以因應全球供應鏈調整」(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分場主辦，充分展現台灣，以及中國大陸、日本、南韓等東北亞代表性國家對於全球重要議題的解決能力。

四、爭取在台舉辦 GES

透過參加「GES 2014」、「GES 2013」、與 Kiel 研究院共同主辦「2014 年台北研討會」(GES Taipei Workshop)，以及擔任「GES 2014」分場主辦的經驗，積極與主辦單位及國際重要具影響力人士建立人際網脈，學習 GES 運作模式與規則，期能進一步爭取在台舉辦 GES。

貳、會議過程與紀要

一、開幕

(一) Opening Speech

時間	2014年9月7日，8時30分至8時45分
地點	Room “Plenary Hall”, The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演講人 (Speaker)	Dennis J. Snower , President,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President, 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rmany
會議紀錄*	黃晏青

演講內容

大會主題說明

1. 去年全球經濟論壇(GES 2013)的主題是「重新定義成功」(Redefining Success), 今年的主題為「經濟重建 社會轉型」(Restructuring Economi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這個論壇的主要目的是收集並討論全球比較不受重視、但關鍵的“孤兒”議題，例如貧窮、公共財、包容心...等，而我們也體認目前全球在生活、環境及社會等均面臨重大變革。
2. 8,000 到 10,000 年前，我們由狩獵和採集的生活進步到了農業社會，使我們有足夠的食物和資源建立城市，從此改變了我們的政治和經濟活動方式，也建立了帝國。然而帝國的存在無法符合社會的功能，於是有了封建社會的分散式生活和工匠與貿易的興起。工業革命之後，機器取代勞動，發展出更複雜的社會和經濟互動條件。
3. 現在社會運作的經濟體系就像一棵大樹在地表上的部分，但是在地底下非常重要的根基卻是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各類社會整合條件。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奈米、數位、網路混合的時代，市場以價格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動力，但是許多社會不能夠量化和彌補的條件，需要持續關注並進行各種轉型。

全球諸多社會問題無法藉市場機制合理彌補

1. 從過去我們信仰的主流經濟學得知，每個人追求個人的私利之後，那隻看不見的手會將許多事件整合至合理的條件。但是我們逐漸知道，現在全球許多社會問題所造成的個人損失，卻沒有合理的彌補機制。我們需要經濟面的整合方案，這是所有主流經濟學不曾也不會提到的事情。
2. 我們要針對經濟大樹底下的社會根基進行一些工作。過去不同國家採取不同的方式，關鍵就在於必須要與主流價值配合並且獲得認同。我們也了解到歐洲成功的方式並不見得能夠適應在其他的地區，例如，中國大陸採取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印度必須考慮到傳統階級制度的存在等。先進國家過去的經驗也告訴我們，法律的運作必須發展到自發而非強制的階段，才能夠使得社會系統可以自然地帶

動經濟的發展。

3.2010 年馬來西亞總理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說中，提出馬來西亞各個族群之間互相包容的案例，提醒我們社會內部關係的和諧，將會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就像我們不能夠只在乎樹木枝葉的茂盛，而不在意樹根的和諧與穩定一樣。

4.工業化結合了人們的工作與生活，也轉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帶動城市的興起。今天我們正處於社會和經濟共同轉化的關鍵時刻，全球面對了更多社會的破碎區塊，例如保護主義、國家主義、宗教衝突、移民問題等。我們也面對了像柏林圍牆不容易穿透的障礙，造成了社會的區隔。值得慶幸的是，近年來認知社會學已經告訴我們，在面對多重認同的條件之下，我們可以投入選擇與他人更多元化的認同來共同打造新的社會，因為責任心和同理心都是可以被訓練和養成的。

5.我們可以塑造共同的社會系統，獲得共同的目標和成就，在個人私利所帶出的共同利益的力量不足的時候，就是我們利用社會共同合作來攜手努力的時候了。



2014 年 9 月 7 日「GES 2014」開幕典禮照片

*:本場會議紀錄主要內容由工研院楊致行資深督導撰擬

(二)Opening Plenary

主題	Opening Plenary Restructuring Economi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8 時 45 分至 10 時 15 分
地點	Room “Plenary Hall”,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Nik Gowing , International Broadcaster, UK
與談成員 (Panelist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ászló Andor, Commissioner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Azman Mokhtar, Managing Director, Khazanah Nasional Berhad, Malaysia• Chandran Nair, Founder and CEO, 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 Hong Kong• Irene Natividad, President, Global Summit of Women, USA• Abdul Wahid Omar, Minister,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Malaysia• Joseph Stiglitz, Nobel Laure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IPA),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會議紀錄*	黃晏青

會議內容

全球貨貿及服貿面臨重大轉變

全世界正在面臨與過去貨物及服務貿易大相逕庭的重大轉變，主要是從 1980 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和全球化運作下，造成大規模的機會不平等，進一步塑造了社會和市場的不公平，進而衍生成全世界 21 世紀的政治問題。現在的市場運作仍然存在，但是我們如何轉變過去所造就出的不平等機制，將是極重大的挑戰。

重建經濟新秩序

- 1.如果檢討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 6 年間我們學到了什麼？關鍵在於我們以往所發展的系統和經濟運作，正在變化和重組，但是我們卻沒有考慮到它的脆弱性。因此我們需要社會和經濟體系的再演化，例如，歐洲過去自我保護不出錯的做法已明顯不足，必須要考慮人力資本變化所造成的影響及因應，如何重建經濟新秩序已經是歐洲甚至全世界的挑戰。
- 2.如同 Snower 教授所提到的大樹和樹根模式，代表了我們經濟和社會的相互依賴和互動條件。但是別忘了我們需要更多的外在條件，例如水、肥料、蜜蜂等來協助。過去多年以來，我們已經了解對世界改變的不同看法，和對於未來繁榮的不同訴求，而且也深刻了解亞洲國家和歐美地區的極大差異，例如，印度所需要的不是大家現在談論的智慧城市，而只是一個乾淨的城市。

包容性成長的三大重點族群

- 1.當我們談全球包容性成長時，有三個族群我們應該特別考慮：(1)女人，占全世界一半人口而未發揮的女性就業力，人數比中國和印度的就業人口還要多；(2)

年輕人，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比過去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卻有最高比率的未充分就業；(3)移民，全世界各地的移民，普遍在經濟和社會條件上失去自我認同。如何在政治與政策上整合這三個族群，而形成全球的和諧與繁榮，則必須要極敏銳的掌握各種條件，並建立整合的方案。

2. 面對世界未來的改變，我們需要更多創意的方案，特別是利用年輕人的新構想來協助我們解決問題。例如，全球比較窮的 20 億人口沒有與銀行往來的經驗，而這些分布在廣大落後地區的民眾，如果我們能夠透過無線手機的運作、將網路銀行導入，並且滲透到社會中，就有機會創造出很多新的經濟活動和機會——這就會促成跳躍式進步，而不需要追隨過去先進國家投入龐大的網路資金。

重新定義成長

1. 全世界的國家在最初成長的過程中，已經遭遇到對成長的重新定義，特別是量化和公平的條件，以及最終的目標為何？是工作機會、學習或是科技導入生活？這些對於亞洲以國民所得高度成長為目標的國家，例如，馬來西亞(GDP 成長率為 6%)特別重要，因為必須要在成長過程中重新建立公平的社會條件。每個國家都應該有特定的資源和背景可供利用，例如，馬來西亞政府就充分考慮利用政府的主權基金來做發展的動力之一。
2. 面對全球轉變的過程，我們應該有更多的世代融合。例如，老一輩應該更開放、大膽，多利用手機和網路世界；而對於年輕世代則應該為他們創造更多的機會。過去我們對年輕人所提供的創業條件非常不夠，不但現有教育系統提供他們的知識和技能不足，而且社會也沒有充分支應的基本創業資金。未來我們應該提供比現在小型貸款更積極的基金，使年輕人可以創造和把握我們老一世代所不了解的新機會。
3. 全球現在面對的很多基本問題，不是市場機制可以解決的，例如，氣候變遷和水資源等，無法透過市場機制決定或改變價格。但可以將很多正確的做法透過新時代的廣告和行銷，像 Google 和臉書一樣來引導社會朝向正確的方向發展。因為改變通常是很困難的，我們只有建立一個希望社會是什麼樣面貌的共識，透過由上到下的共同努力才能夠有效地推動社會的進步。
4. 未來世界轉變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採取更積極的態度和方法，就如同企業從滿足顧客要求，進一步用創造和創意的方式引領顧客充分了解，並且進入他們真正的需求。這個養成的過程中，我們有非常多來自手機和網路世界的技術和資源可以應用，但是背後真正的關鍵則是創業精神。過去我們已經充分了解和傾聽了問題，但是因為量測和指標不明確，而使我們不願意採取各種的方案。在這個不公平制度下相關利益群體不斷增加的情形，政治人物應該立即採取創意和包容性成長的各種手段來推動世界的持續穩定發展。



2014年9月7日「GES 2014」開幕典禮照片

*:本場會議紀錄主要內容由工研院楊致行資深督導撰擬

二、開幕晚宴

主題	The Future of Jobs
時間	2014 年 9 月 6 日，20 時至 22 時
地點	Room “Kedah”,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Dennis Görlich , Research Economist,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Germany
與談成員 (Panelist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ászló Andor, Commissioner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 European Commission• David Arkless, CEO and Founder, ArkLight Consulting, UK• Duncan Campbell, Director for Policy Planning in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witzerland• Chung-Ming Kuan, Minis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Taiwan(管中閔主任委員)• Edward Lazear, Professor of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Irene Teng, Regional Director, CIMA SE Asia & Australasia, Malaysia

會議討論重點*

教育制度再改革

教育制度再改革已是普遍的共識，但是，要指明未來 10 年、20 年、甚至更遠的未來所需的技能種類為何是一件困難的事，因此，更重要的是，該如何培養學生在職場/職涯當中亦能夠自主獲得新技能、新知識的能力。除此之外，也該培養學生具有創意思維模式，就算未來先進科技可能讓某些工作類型消失，有創意的人並不因此而受害，還能夠發展出新的商業點子、發展新事業，甚至創造新工作。

隨著先進科技與全球化日益發達的發展進程，我們充分認知且同意，唯有透過教育制度再改革，才能正確因應勞動市場所面對的新挑戰。我們同時清楚知道並強調，教育制度的確需經過一段漫長的時間，才能獲得一些初步的改革成果。其中一位與談人提到，也許我們該討論的是未來的工作類型，而非未來的就業機會，因為，某些未來的工作類型由個人自營作業會有更好的發展，則不需受雇於企業，如此一來，薪資僱用水準對於個人就業機會的關聯性或是影響性便會逐漸降低。

手腦並用的重要性

學校要教導學生/孩童的不只是讓他們動手學習，還要能夠動腦學習。

鼓勵終生學習

先進科技將會促使經濟發生結構上的改變，勞工則需要持續獲得新技能以面對與因應各種挑戰，因此，在職業生涯當中，我們需要持續地鼓勵勞工學習新技能、獲得新知識，即使我們還未能清楚知道何時會用到這些新技能/新知識。就這方面而言，企業同樣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同樣需要企業認知員工在職進修、再訓

練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能提高員工的工作品質與生產力。因此，企業或許能夠為自家員工提供企業自有一套的訓練課程，幫助員工培養獲得新技能、學習新知識的能力，這樣的做法也能夠鼓勵員工尋找企業外部機構所提供的培訓機會。

靈活彈性的、具有流動力的勞工是重要的

勞工也許希望同時獲得不只一份工作，比如說，他們可能希望同時錄取 2 至 3 份兼職機會，如此一來，若是他們失去其中一份工作，他們還是能夠從事其他工作。另一方面來說，勞工必須有足夠的心理準備，當他們失去一份工作時，亦需能夠具備/擁有新技能以獲得其他工作。

政府需更積極地提供輔助勞工轉職的訓練課程

當勞工有需要或是被迫轉職時，政府應更積極地提供輔助勞工轉職的訓練課程。為了能夠正確因應勞動市場所面對的新挑戰、提供適當的訓練課程，「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簡稱 PPP)是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也就是說，產/企業亦要能夠同時涉入此事，原因在於他們能夠瞭解或是期望勞工需擁有什麼類型的工作技能。

政府需鼓勵企業有效率地雇用在本地人才

政府可透過減稅、薪資補助...等方法留住企業不外移、雇用在本地人才，以及推動企業升級。

更彈性的工作方式

舉例來說，我們不應僅認為先進科技會取代人們的工作機會，而應改變思維，先進科技會提升人們的工作效率、讓人們工作更方便。有研究顯示，人們在家工作的效率有時會高於在辦公室時的工作效率。



2014 年 9 月 6 日管主委擔任開幕晚宴講題「The Future of Jobs」之桌次主持人

*:本場會議紀錄主要內容由臺灣大學王泓仁教授、Kiel 研究院劉宛鑫博士、工研院黃筱雯副研究員撰擬

三、一對一晤談

(一)管主委與 Dr. Joseph Stiglitz 晤談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0 時 30 分至 11 時 30 分
地點	Room “ Mezzanine2”,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晤談對象	美國哥倫比亞教授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Dr. Joseph Stiglitz
我方與會人員 (敬稱略)	國發會：管中閔、黃晏青、邱莉婷 工研院：杜紫宸 台灣大學：王泓文
會談紀錄	邱莉婷

會談重點

台灣在區域經貿整合的角色與因應

1.管主委表示，中國大陸為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然而近來，我們在面對與中國大陸的貿易協定卻面臨若干問題，包括反對者認為與中國大陸簽署貿易協定，係嘉惠大型企業及財團，不利中小企業及弱勢團體，亦不贊成過於倚賴中國市場的經貿政策；今年國內並發生由學生發起占領立法院及行政院的學運事件，甚至有人提議對貨貿協定受益的業者徵收「貨貿捐」。工研院杜主任補充，台灣若沒有與中國大陸簽署貨貿協定，將迫使台灣石化、機械、汽車零組件等產業的加速外移。台灣得先與中國大陸完成服貿、貨貿協定，才有機會與其他國家洽簽經貿協定。RCEP16 個成員涵蓋了亞洲主要國家，僅台灣與北韓未被列入。

2. Joseph Stiglitz 回應：

中國大陸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一環，不可能將其排除在外，對於台灣積極加入區域經貿整合或與大陸簽署 ECFA 至表贊同。中國大陸是重要的市場，政府有必要提供中小企業相關協助，整合資源共同洽談商機，並加強宣導政策以強化民眾信心；另方面須考量所得不均等問題的擴大與因應：

一**參與經貿整合必要性**：有關加入區域經貿整合是否帶來產品關稅上的利益很難說，畢竟 WTO 已帶來關稅的大幅降低，尤其是工業產品。但洽簽 FTA 仍具有進一步降低關稅及擴大市場合作的好處，對台灣來說，除了關稅考量外，也有避免被邊緣化的意義。對於台灣積極加入區域經貿整合或與大陸簽署 ECFA 至表贊同，中國大陸已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基地，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或不與其合作是不可能的。

一**協助弱勢**：經濟學的簡單模型假定全球化或區域整合可增進經濟發展進而創造就業，將就業機會由不具效率移至較具效率部門，惟實際上，僅創造了低薪資工作的就業機會。全球化的影響不會有單一的解決方案，也很難定義那些部門受益，反倒是受害部門較為容易辨識，如中小企業。因此，政府部門可以做的事，即是協助中小企業彼此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或成立拓銷基金，共同開拓海外市場。在參與區域經貿整合過程中，受惠的多

為大型企業，尤其中國大陸是如此重要的市場，政府有必要提供中小企業相關協助。鑒於中小企業在貿易洽談所須成本相對較高，若能在資訊、洽談商機方面進行整合，降低協商成本，有助中小企業擴展市場，增進合作機會。

- **加強宣導**：不管從總體經濟或在地的觀點來看，必定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在此情況下，沒有絕對的解決方案，惟可藉由告訴人們那些產業獲利，鼓勵受益產業增加就業，加強宣導對社會的可能好處等，強化民眾信心；另一方面須考量所得不均等問題擴大，政府適時提供必要的協助。

爭取美方支持台灣加入 TPP

1. 管主委表示，目前我國在爭取美方支持我國加入(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方面，由於美方希望我國先在牛豬進口政策立場調整，以利後續議題協商，惟目前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殘留標準，在國內仍存爭議，未來如何增進相互了解，為當前台美重要的課題。

2. Joseph Stiglitz 回應：

落實與中國大陸的 EFCA 協定及加入 TPP 是值得努力的方向。美國貿易政策的形成，背後多有利益團體、遊說活動等支持，或許可透過影響美國其他社會團體，遊說其支持我國立場：

- **TPP 進度存在變數**：美國 TPP 協定，不完全是關稅的考量，主要在與中國大陸抗衡，並基於美國自身立場而推動，因此 TPP 不會是公平、對等的貿易協定。加上美國在與歐洲簽署跨大西洋貿易及投資夥伴協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TIP)，尚存美國國會未授權等問題，將阻礙 TPP 之談判進度，TPP 未來的發展並非如此樂觀。鑒於 WTO 杜哈回合談判延宕，致區域經貿合作加速進行，對台灣來說，落實與中國大陸的 EFCA 協定及加入 TPP 都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 **美方立場具主觀性**：全球化促使產業朝有效率的發展，惟不見得有利就業；洽簽優惠的協定亦不見得真的優惠，如美國仍對汽車、農業仍有所保護，在菸草等關稅議題亦與其他成員存在爭議，美國對 TPP 立場，主要為了促進市場開放，不見得對所有成員有利。美國有時對各國基於金融穩定、消費者意識等，所形成的非關稅障礙，無理的要求排除；美國對外協商，亦多以大型企業利益為考量；另外，美國認為一旦開放或妥協條件，其他國家也要求比照，反對協定內容有所退讓等，都是與美方談判可能面臨的問題。
- **公平立場簽署協定**：有關簽署貿易協定，本人關心的重點在於簽署協定的雙方是否具有公平立場。全球化原本應可將就業機會由受保護的產業移至具效率的產業，但現在反而導致失業，這是必須關心的重點。另外，自由貿易協定常不符其精神，通常是有利相關利害團體，如美國汽車、紡織及農業永遠都是被保護的，菸草貿易也存在爭議。美國常要求對手國開放市場，但本身卻很難做到。各國基於需要而就智財權、基因食品、環保等規

定，或為保護娛樂、醫藥等產業發展，甚至因應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之金融監管對策，而在貿易談判上有所堅持時，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向來不予理會。另一例如：智利基於金融穩定進行資本帳管制，擔心違反與美國簽定 FTA 有關資本進出之規定，導致貿易爭端。

- 一應有其他遊說管道支持我國立場：至於台美在牛豬進口政策問題方面，歐盟也有同樣經驗，如基改生物產品（GMO），一般來說，產品須有明確標示進口來源或成份，提供消費者選擇，但美方認為標示即形成貿易障礙。本人認為消費者有權利了解購買產品的成份或來源。美國貿易政策的形成，背後多有利益團體、遊說活動等支持，或許可透過影響美國網路社會（Cyber Society）或向來對 USTR 政策不滿的美國社會團體，遊說其支持我國立場。

因應區域經貿整合，台灣可能的產業發展利基

1. 管主委表示：

- 一台灣產品關稅進入東協國家仍有較高的關稅，一旦東協加一生效，我們亦須面對與中國大陸在東協市場的競爭。目前東協國家中，我們僅與新加坡簽署 ECA，台灣也與紐西蘭簽署 ECA，但這二個國家都是先與中國大陸簽署 FTA，才肯與我們洽簽。中國大陸駐馬來西亞大使日前於吉隆坡公開反對馬來西亞與台灣簽署 FTA。
- 一外國人希望台灣作為一個營運中心或前進中國的據點，但必須更為開放才行，此點國人有所疑慮，特別是對中國大陸的開放，如吸引陸籍學生來台等。

2. 工研院杜主任補充：

- 一台灣中小企業在 R&D 資源較為缺乏，因此政府一直都有提供相關協助。目前韓國與台灣尚未加入 TPP/RCEP，一旦 TPP 及東協加六生效，不利台灣產品與韓國在關稅方面的競爭力。
- 一目前東北亞國家，韓國相較日本更希望進入中國市場，台灣目前積極與日本合作以平衡西進力量，五年前台灣在技術上還有競爭力，現在中國大陸發展地化產業政策支持下製造技術逐漸成熟，台灣與中國大陸反倒形成競爭關係。因應此問題的唯一方法即是投入更多創新研發資源，從企業角度則認為應與中國大陸合作，所以加速移入研發中心，台灣政府則從加強與美日合作來制衡。
- 一人才部分，台灣優秀學生畢業後至其他國家工作如：中國大陸、香港及新加坡的問題令人憂心，與 20 年前台灣留學生回台服務貢獻的情況不同，也不渴望至歐美先進國家留學，部分年輕人甚至待在家裡。如何吸引優秀人才回到台灣職場，是各界關心的議題。
- 一有關國際醫療及教育合作是政府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的重點產業。新加坡大學與英美等知名學府合作、交流，台灣亦可比照辦理，目前外國教授太少，教育應朝國際化發展。

3.台大經濟系王教授補充

- 關於吸引外國教授來台，在薪資方面是最大的問題，此外，學生亦擔心外國學校來台，會使他們的權益受損，台灣教授亦有至中國大陸授課的情形，本地學校留不住好的學生及教授，尚有很多須要對內溝通之處。惟台灣仍存優勢如言論自由與民主精神等，亦為外資前進中國大陸投資及合作的跳板。

4.Joseph Stiglitz 回應：

台灣創造良好的生活型態及機能，自然就可以吸引人才在台駐留，未來應加速服務業發展，或就具發展潛力的產業提前準備，如老人化社會有關商機、推動國際教育，肯定台灣在示範區發展教育及國際醫療服務業的推動方向：

- 加速發展服務業的實力**：台灣與中國大陸存在互相競爭或合作關係，並處於政治上的難處，現在中國大陸逐漸透過增強製造能力，減少對台灣、韓國及日本依賴，如同歐盟的德國與義大利的關係，德國憂慮義大利透過複製德國技術，在一些可靠度較低的出口產品方面，與義大利已形成競爭，由於中國大陸已是世界工廠，未來在製造業方面只會更為進步，台灣以製造業為主的輸出模式，難免會有所衝擊，未來應加速服務業的實力，或就具發展潛力的產業提前準備，如老人化社會有關商機、推動國際教育等。
- 形塑台灣良好生活環境**：中國大陸的生活環境不佳，本人於此次 GES 會議期間，其他與會者交流意見時，亦有同感。由於台灣生活條件相對優良，建議可提供合宜的生活環境，以吸引國內外人士在台工作，吸引國際學生來台，如同北歐國家在歐洲定位一樣，小國也能透過提供良好的福利、生活環境、優良教育等方式，找到發展的利基，台灣沒有理由不如此做，透過創造好的生活型態及機能，自然就可以吸引人才在台駐留，並形塑較台灣能夠提供比北京及上海更佳生活環境的形象。
- 教育服務業為台灣發展利基**：很多人關心下一代的環境，高薪並非留住人才的條件，因此，可以改變年輕人對台灣的印象來著手。英語是國際共通語言，不管是吸引學習中文或國際化課程，都是須具備的條件，台灣的生活環境，具備與中國大陸相同中文環境，這部分應可成為台灣的發展利基，甚至發展成為教育研究中心，相對美國學費高昂，中國大陸人民也適合來台學習，就像中國人民流行去澳洲留學一樣。台灣可持續創造有關環境，並促進與國際學校或中國大陸學校的合作機會，不僅招募外籍生來台，亦可招募中國大陸學生，一方面發展教育服務業，另一方面亦形塑台灣為研發的基地。肯定台灣在示範區發展教育及國際醫療服務業的推動方向。台灣的教育要朝國際化發展，有必要與其他國家合作，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及商機，像北京及清華大學都已做得很好。以本人任教之哥倫比亞大學為例，陸生約占 10%，多數係自費留學，英語能力不佳；台灣具備民主的價值，中國大陸則尚在轉變中，學生到海外留學也日益增多，基此，台灣具有利基發展教育產業。

一醫療產業具前景：高齡化的可能商機亦可加強研析，如日本高齡化問題嚴重，部分企業已開始研發醫療或照顧產品。台灣亦可就未來社會發展的趨勢，提早進行準備，協助企業發展。新加坡在促進健康產業方面已相當規模，台灣在高科技業有發展基礎，應可從此方面著手。中國大陸亦有高齡化問題，高財富人士比起到歐美等昂貴地方享受醫療或健康服務，不如來台灣，所以這是充滿商機的產業。



2014年9月7日管主委與 Dr. Joseph Stiglitz 晤談及合照

(二)管主委與 Dr. Richard Baldwin 晤談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2 時至 12 時 30 分
地點	Room “ Mezzanine2”,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晤談對象	瑞士日內瓦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Dr. Richard Baldwin
我方與會人員 (敬稱略)	國發會：管中閔、蔡瑞娟、邱莉婷 工研院：洪立瑜、
會談紀錄	邱莉婷

會談重點

管主委發言摘要

- 1.管主委表示，台灣近來積極參與區域經貿整合，協助廠商取得出口利基，長期看來，仍須思考產業結構轉型調整，惟台灣產業結構以製造業為基礎，亦為以往強項，短期不易立即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型態。
- 2.鑒於國內對於與中國大陸簽署經貿協定仍有疑慮，中國大陸駐馬來西亞大使日前並於吉隆坡公開反對馬來西亞與台灣簽署 FTA，藉今日會談聽取 Baldwin 教授對於貿易政策的看法；另外，關於歐債危機後的歐洲經濟展望、德國經濟是否能繼續引領歐洲經濟等問題，亦與 Baldwin 教授交換意見。

Dr. Richard Baldwin 回應重點：

- 1.**參與經濟整合有其必要：**簽署經貿協定雖可增進福利，但政府要很清楚簽署的內容與影響，尤其面對的是中國大陸這樣的大型經濟體，注意所得分配及失業問題，提供必要協助及處理，包括社會政策、教育福利等，以減少衝擊。參與區域經貿整合其實沒有太多的替代方案，與中國大陸簽署經貿協定有其必要，即便政府不簽 ECFA，人民還是會抱怨因而失去中國大陸的商機，而且不簽 ECFA，人民的福利就不會受損，是不對的想法，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還是會透過市場機制傳導至個別國家。不是只有台灣要面對中國大陸，美國、日本、韓國、香港也想參與中國大陸市場，其他國家都極積洽簽，台灣有必要加緊追上。
- 2.**台灣與中國大陸應相互合作：**美國與墨西哥因地理的接近，很早就加強彼此經貿合作；在簽署 FTA 之前，還有很多方式可以增進經貿合作，如：日本居全球產業供應鏈重要地位，基於歷史因素，雖沒有儘早與亞洲國家簽署 FTA，但早就透過廠商布局投資，及洽簽經濟夥伴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方式來穩定全球供應，進而提供日資企業所需金融服務，帶動日本金融向外拓展，有助奠定日本金融業的全球地位；再舉如：日本與泰國簽署 EPA 有關金融服務業的定義係只要在日本有登記即可適用，全球化下，多國企業很難定義國籍，也就是為什麼 TPP 很重要的原因，不光是關稅、貿易的問題，而是足以影響供應鏈布局。台灣藉加入 TPP 可檢視國內智慧財產權 (IPR) 等問題，對不具競爭力的產業進行自然的淘汰，沒有人可以搭便車 (free ride)。台灣可向日本學習，在簽署經貿協定前，先以投資方式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進行

布局，奠定良好洽簽氛圍。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有強烈的地域關係，加上又是主要貿易對象，若不互相依賴，是不實際的想法。

3. **加速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外包的重要性日增，因應區域經貿整合的產業發展，由於台灣具備中文環境的優勢，或許可考慮發展相關服務業，如：參與陸資企業外包及發展教育服務業等，另一方面也可以降低對製造業依賴。依據 OCED 統計出口附加價值資料顯示，印度出口附加價值 40% 來自服務業，印度透過提供服務，在全球服務的供應鏈已占有一席之地；反觀馬來西亞、韓國、泰國等仍高達 68% 出口附加價值來自製造業。印度透過提供服務參與全球供應鏈值得台灣參考，當然主要是印度的製造業相對落後，也不重視勞工或智財法規，英文反而成為印度發展服務業的優勢。中文是台灣的優勢，不可忽視有關商機。以發展觀光業為例，開放陸客來台亦可增進非技術性 (unskilled) 就業。
4. **製造業與服務業為一體二面**：製造業與服務業是產業附加價值曲線 (微笑曲線) 的重要活動，彼此界線很難切割，自然而然地就會有所關聯，像日本、德國及美國等製造業亦伴隨服務提供，其中，日本是產業及相關企業共同到投資目的國發展，海外投資亦帶動金融業海外據點的拓展；日本在泰國投資製造業不僅帶動金融服務，也因而帶動外人直接投資 (FDI)，日本作法確實值得參考。OECD 針對 58 個國家衡量貿易附加價值 (Measuring 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相當具洞察力，也許是很粗略的分析，但可以作為貿易政策參考。由於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 (IDE-JETRO) 投入產出表 (Input-Output table) 有台灣資料，印象中 OECD 的 TiVA Database 應含蓋台灣。WTO 前處長 Pascal Lamy 有參加本次 GES 會議，他是當時提議建立並推動，有問題可以與之接洽。
5. **瑞士公投影響經濟政策，不見得適用其他國家**：公投在瑞士已行之有年，近來亦曾就移民問題或最低工資等議題提出公投，在國際上具有其獨特性。公投運行至目前為止，尚屬良好的政策工具，主要因為瑞士有很多的政黨，種族亦相當多元，為了平衡各方意見，因此採行公投作為經濟政策的參考，也是公民推翻政府制定法律的方式，公投通過後，亦具有拘束力。惟不見得每個國家都可以如此處理，還是須視國情而定。民主是好事，但公投可能成為抵制政策的工具，而且人民不見得深入了解公投議題，所以在處理上仍須小心。
6. **歐洲經濟緩慢成長**：歐債危機後的歐洲經濟，感覺歐洲似乎進入失落十年 (Lost Decade)，甚至失落二十年；低物價、低利率、成長陷入停滯 (Stagnation)，加上歐盟國家財政工具欠缺自主性，歐洲央行量化寬鬆政策似乎很難有所做為，基本上對下半年的展望很難樂觀，長期來看，本人認為緩慢成長的機率較大，除非有重大變革。企業經營規模縮小也是問題，法國、德國銀行業為因應歐債危機須補充資本不足，以符合資本適足性，導致銀行收緊銀根，民眾失去信心，害怕回到 2011 年歐債危機情況。至於德國是否主導歐盟經濟，由於德國主張縮減財政支出，反對歐洲央行發債採行寬鬆貨幣政策，深怕債務高築，歐盟成員向來不滿德國過於強調緊縮措施。

7.WTO 談判進度遲緩：WTO 多邊的經貿體系，因多哈回合談判進程延宕，自從中國大陸加入 WTO，與美、日、歐盟等大型經濟體形成抗衡，加上低度開發國家的立場不同，很難達成共識，這個在 20 世紀當道的多邊經貿組織，未來展望仍不樂觀，需有因應 21 世紀的作法，在貿易政策上進行變革才是後續持續推展的關鍵因素。基此，使得 TPP 等區域經濟協定或 WTO 下 TiSA（服務貿易協定）等個別議題協商機制因而盛行或崛起，成為多邊協定的替代方案。



2014 年 9 月 7 日管主委與 Dr. Richard Baldwin 晤談及合照

(三) 管主委與 Mr. Jonathan Woetzel 晤談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4 時 30 分至 15 時
地點	Café Lounge ,The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晤談對象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亞洲區董事 Mr. Jonathan Woetzel
我方與會人員 (敬稱略)	國發會：管中閔、黃晏青、陳淑貞 工研院：洪立瑜
會議紀錄	陳淑貞

會談重點

中國大陸當前經濟挑戰與機會

1. Jonathan Woetzel 表示中國大陸推動經濟改革，帶來快速工業化與城鎮化，為中國大陸帶來本質上的變化。隨著經濟變化的同時，亦對其文化與行為產生影響。雖然大陸在政經上仍充滿許多不確定因素，但是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企圖心極強，且擁有一定的發展決定權，使得地方經濟發展非常快速。
2. 此外，網路科技的興起，降低創業成本與門檻，並提供機會，由民間發起與經營諸多網路相關企業，讓民間企業擁有更多動能。過去，由多國企業與國企掌握著大陸經濟影響力，現在，隨著民間企業崛起，轉為由多國企業、國企、和私企三分天下的狀況。
3. 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能源、資源永續性議題，以及污染防治問題已成為大陸關切重點。為確保能源、資源的穩定供應，對外，政府積極拓展國際，進行策略投資與合作，對內則積極發展各項新能源。短期間內，具有實際效益的能源效率化（energy efficiency）產業，如：各種節能減碳的應用，將在大陸產生龐大商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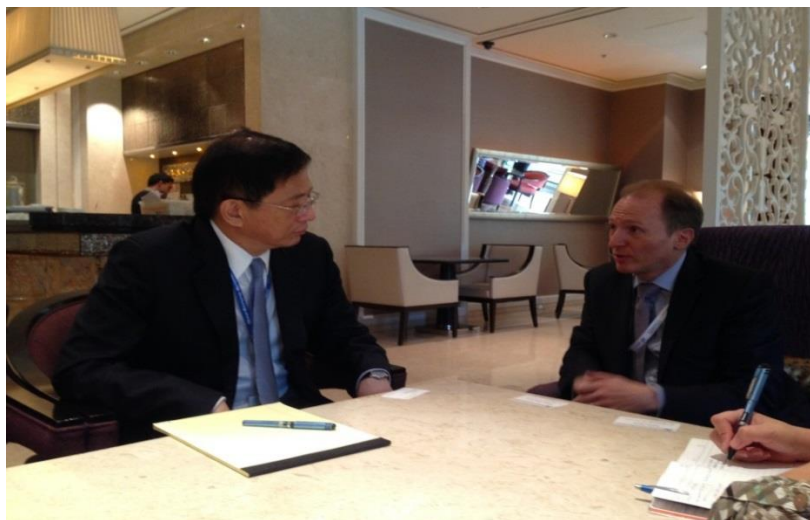
建構台灣新的競爭優勢

1. 管主委表示，隨著中國大陸推動產業供應鏈在地化，並透過高薪吸引台灣優秀人才外移。面對台灣產業、資金與人才陸續外移至大陸，已對台灣經濟根基造成威脅。
2. Jonathan Woetzel 表示，面對大陸產業升級及供應鏈在地化，對台灣高科技製造業造成擠壓效果，轉型致力發展服務業，雖是不錯的作法，但是台灣若能聚焦於既有優勢上的突破，效益將更突出。
3. 服務業與製造業原本即非絕對分立，奠基在製造優勢上，發展與製造相關的服務業，將有助於台灣建構新的競爭優勢。以國際角度觀之，台灣優勢在於具有世界級的群聚和優質的勞力。此外，台灣的企業家相對願意承擔風險，且熟悉產業供應鏈運作模式。台灣應該整合這些優勢與能力，發展與製造相關的 B2B 服務業，並建構新的價值鏈體系。目前在中國大陸，網際網路已由消費層面 C2C 拓展到商務 B2B 層面，未來更將拓展至線上與線下 O2O，這些都將是台灣的機會。
4. 台灣產業發展的成功關鍵，就是創新。創新政策應聚焦在人才，讓人才更願意

在本土發揮。台灣目前吸引創新人才的優勢，在於社會的自由，和願意付出者可取得相對經濟報償的公平機會。政府需要排除所有不利創新發展的障礙，營造有利創新人才持續成長發展的環境，鼓勵具創新能力的創業家，提供更多的機會，及協助讓他們能快速接觸到資金、市場和顧客的管道。如韓國政府即針對創新活動，提供高速網路、創業空間、資金等有利發展的環境。

推動台北市發展成為國際智慧城市(Smart City)

Jonathan Woetzel 表示，麥肯錫在台灣有多項合作經驗，其本人亦與前中油董事長（現台塑化）陳寶郎曾有合作。未來希望能提供主要都市如台北市，在智慧城市上的交流機會，對於城市的能源效率、交通承載等基礎建設優化部分，提供整體性規劃構想。以台北市的規模和發展階段而言，其實非常適合成為國際智慧城市的典範。



2014年9月7日管主委與 Mr. Jonathan Woetzel 晤談

(四) 管主委與 Dr. Duncan C. Campbell 晤談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6 時至 16 時 30 分
地點	Room “Mezzanine2”, The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晤談對象	國際勞工組織(ILO)就業政策司司長 Dr. Duncan C. Campbell
我方與會人員 (敬稱略)	國發會：管中閔、蔡瑞娟、賀麗娟 工研院：洪立瑜
會談紀錄	賀麗娟

Dr. Campbell 為國際勞工組織就業政策司司長，專精於國際勞工政策、福利制度等。本次晤談主題為基本工資、弭平產學差距等問題。Dr. Campbell 表示**基本工資提升有其必要性，唯須針對國情且避免歧視性條款。位於相同賦稅與司法管轄區域者，應有相同的待遇。政府則應多鼓勵社會企業，並提供有效工具理解企業與學生的需求，補助、但不主導職業訓練。**會談重點如下：

1. 基本工資的制定，是否可區分本國勞工與外勞？

關於基本工資採取雙元制 (two tiers) 在理論和實務上仍在論證。但原則上不建議以勞工的國籍區分，只要位於相同的稅務司法管轄區域，就應該採用一樣的標準和待遇。實務上，雙元制有幾種方式：

- (1) 以年齡區分，對年輕人給予次級最低工資 (sub minimum wage)，提高雇主僱用年輕人的意願，但可能排擠中高齡就業機會。
- (2) 以地區區分，如越南，依據地區發展與生活水準的差異，訂定不同的最低工資。建議可以採該地區平均工資的一定比率，如 40%，做為當地最低工資的基準。
- (3) 以行業別區分，根據產業或行業差異訂定。但這或許會扭曲未來勞動力的供應。

基本工資在美國也產生很大變動，有人提議將最低工資調高至 15 美元，將近現行的兩倍。美國目前問題在於最低工資其實低於該國貧窮線，近年實質薪資成長其實是停滯的，已有些州打算提高最低工資水準。有人擔心調升最低薪資會造成通貨膨脹，但對於整體經濟而言，通縮才是問題。

2. 社會企業提供一個可自給自足的系統，並創造可謀生並有尊嚴的工作機會，是否可做為解決青年就業的方案之一？

社會企業在國際勞工組織稱為社會經濟，包括可以獲利、提供就業機會、和提高綠化程度等更具公共性的議題。社會企業有助於青年就業，民間企業較不會關心就業問題。

以希臘為例，政府提供補貼，促進青年就業，增加青年參與勞動的經驗、訓練、移動的機會。資金來源可能是歐洲投資銀行、給予創業資金協助等，如果需要訓練，OECD 可提供借貸。提供工資補貼金額，約為工資的 15%，期間約 6 個月或 9 個月。

3.如何縮短產學差距?

預測未來需要的技能並聚焦發展，很難論斷是好還是不好。因為沒有人能夠確定未來需要的技能為何。政府的功能是建立基礎，而非直接運作職業訓練，例如政府無法回答未來電子的需求為何，也沒人能確定。

國際勞工組織有一項有用的工具，school-to-work transition 調查，運用大量量表，從政府部門取得許多基礎統計資料，並做雇主與學生雙向的調查，了解公司想要的人才，與學生期望的工作，並分析其中的落差，提供產官學參考。由於企業面臨全球化競爭，一切講求速度與市場性，往往希望僱用的年輕人不需受訓即可上手，但這是不實際的。透過調查，雇主和學生可將其需求確實讓政府了解。實際上，年輕男性和女性的需求可能非常不同，也可能一樣，在不同國家就會有不同結果。

技職體系深受不同國情影響。在德國和瑞士，技職學校深受尊重，但在美國卻被視為失敗者。除卻文化因素，建議職訓內容應該由民間來主導，才能滿足需求端的要求。以德國的職業訓練為例，是由民間而非政府決定訓練內容和提供訓練，政府給予以職訓券等方式進行部分補貼。



2014年9月7日管主委與 Dr. Duncan C. Campbell 合照

(五) 管主委與 Kiel 研究院 Snower 院長晤談

時間	2014 年 9 月 8 日，9 時 20 分至 9 時 50 分
地點	Room 1284, The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晤談對象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院長 Prof. Dennis Snower
我方與會人員 (敬稱略)	國發會：管中閔、蔡瑞娟、黃晏青 工研院：杜紫宸 台灣大學：王泓仁
會議紀錄	黃晏青

會談重點

與新經濟思維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INET)建立合作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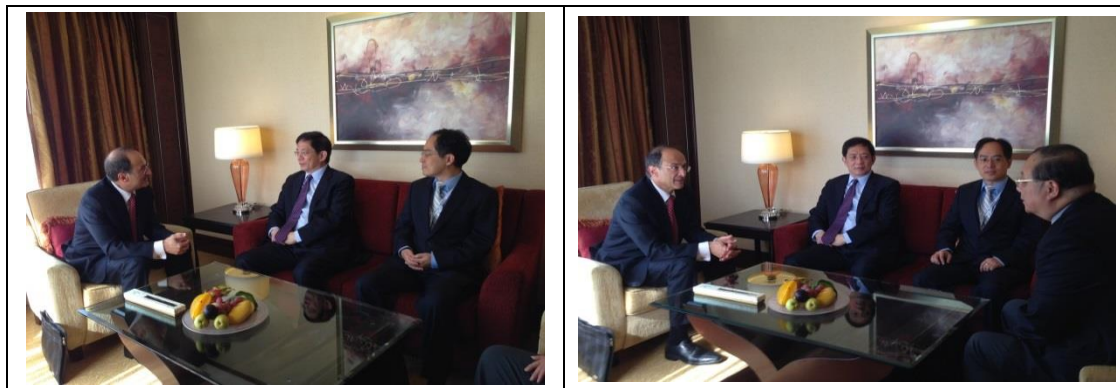
工研院杜紫宸主任與台大經濟系王泓仁教授，9 月 7 日與 INET 院長 Robert Johnson 會晤，期能建立雙方長久交流管道與合作機會，J 院長深表贊同，並引介 INET 香港代表 Judy 作為雙方聯繫窗口，希能邀請我方年輕學者參加 INET 舉辦之會議與活動。

與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Kiel 研究院)規劃近期合作計畫

我方建議在德國基爾舉辦小型研討會，由 Kiel 研究院、國發會或工研院代表與會，就個人研究領域提出心得報告或意見交流。Snower 院長深表贊同，並樂觀其成。

2015 年 GES 台北研討會(GES Taipei Workshop)

1. GES 2015 預計於 2015 年 9 月上旬召開，為配合大會時程，爰我方規劃 2015 年 GES 台北研討會於 5 月上旬舉辦。
2. 2015 年 GES 台北研討會建議以「如何引導年輕族群創新創業」為題，鼓勵年輕族群提出新創意、新想法，建構創新創業新模型、成功企業新典範。
3. 主委於 2014 GES 期間(9 月 7 日)曾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rofessor Joseph Stiglitz 晤談，就台灣在區域經貿整合中扮演的角色及因應、產業可能的發展利基、爭取美方支持台灣加入 TPP，以及我國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等議題交換意見。會中工研院杜主任邀請 S 教授擔任 2015 年 GES 台北研討會主持人或與談人，渠表達高度意願，但表示尚需回美檢視明年行程後，才能回復。



2014 年 9 月 8 日管主委與 Kiel 研究院 Snower 院長晤談

(六) 主委與 Baudouin Regout 晤談

時間	2014 年 9 月 9 日，9 時至 9 時 50 分
地點	Lobby Café Lounge , The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晤談對象	歐洲執委會政策顧問 Mr. Baudouin Regout
我方與會人員 (敬稱略)	國發會：賀麗娟、陳淑貞
會議紀錄	陳淑貞

會談重點

對歐元區經濟展望之想法

1. Baudouin Regout 表示，全球經濟息息相關，歐債危機後，美國經濟受挫，亞洲經濟亦受衝擊。歐元區經濟正面臨經濟成長停滯等問題，穩定經濟成長為其首要目標。ECB 扮演了緊縮金融角色，歐元區經濟，呈現穩定、單調、零成長狀態。銀行體系脆弱，2012 年 6 月歐元地區各國已同意成立銀行聯盟 (Banking Union)，歐元區內銀行均適用相同規範，採集中管理方式。2014 年 11 月起歐元區 6 千家銀行將納入單一監管機制，統由歐洲中央銀行 (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 監管，讓體質不佳的銀行破產，破除政府不能讓大銀行倒閉之迷思。
2. 目前歐元區部分國家債務高築，以致經濟疲弱，物價低迷，雖然外界質疑是否將推出類似美國或日本的 QE，惟個人認為歐元區若推動 QE，形式將與亞洲發行貨幣方式不同。
3. 歐債危機之後，面對經濟成長低迷問題，各國政府已積極推動各項改革，包括：政府效能改革(如:民營化等)、勞動市場改革、教育改革、年金改革等，改革進度甚於以往，期能透過改革，促使經濟轉型，啟動下一波新成長動能。

對台灣探索新經濟成長模式之想法

1. 管主委表示，台灣屬外貿導向國家，競爭激烈，高端產品需面對韓國競爭，低階產品則需與中國大陸競爭。為降低生產成本，多數製造業已外移至中國大陸生產，長久「台灣接單，大陸生產」模式，導致經濟成長與薪資成長脫鉤，實質薪資甚至不及 1998 年水準。
2. Baudouin Regout 表示，1970 年代日本和台灣目前情形很類似，為尋找新經濟成長模式，日本開始從著重外銷市場，轉向內需市場，並從製造業，轉向發展服務業，降低對製造業的依賴。以內需市場為主的服務業，採保護政策，以外銷市場為主的製造業，則採完全競爭機制，這些調整方向，可供台灣參考。
3. 有關市場競爭機制方面，應由市場決定勝出者，留下生產力最具效率者，政府要做的只有降低進入市場門檻，讓競爭者可以自由進出市場。政府不宜干預過多，若要干預，宜拿捏好干預的時機及事項。
4. 有關產業補貼政策，政府應避免過多補貼，如推動 Big Data，政府只需補貼支援大學教育培訓，提供充足人力。不應提供太多其他補貼，干預、扭曲市場。

此外，面對數位經濟時代來臨，政府應完善資訊通信基礎建設；改善勞動市場，提高勞動參與率。

對因應中國大陸不公平競爭之想法

1. 管主委表示，市場競爭機制雖佳，但中國大陸運用政府資源，支援國營企業（包括：補貼、租稅優惠、投融資等），透過高薪吸引台灣人才等，對台灣中小企業造成不公平競爭。長久下來，在市場未淘汰無效率的大陸國企之前，台灣中小企業已先面臨倒閉的威脅。
2. Baudouin Regout 表示，面對此種不公平競爭，與其說提出解決方案，不如說提出降低衝擊的作法，包括：促使國內服務業朝內需市場、地方化、特色化發展，難以複製模仿，持續創新。
3. 台灣可透過區域經濟合作夥伴，爭取國際發聲機會。培育優秀經理人，並支付高薪，創新不只著重製造過程，更應著重市場行銷過程，讓商業更有效率。



2014年9月9日管主委與 Mr. Baudouin Regout 晤談

四、分場主辦

主題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時間	2014年9月8日，15時15分至16時45分
地點	Room “ Penang”,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Tze-Chen Tu(杜紫宸) , General Director, Center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與談成員	Reiko Aoki ,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Hilo Chen , Founder, OneVision, Taiwan DoHoon Kim , President, Kore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South Korea Rong-Ping Mu , Director General ,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會議紀錄	陳淑貞

討論題綱

1. How can firms better adjust their existing business strategy towards innovation and thus enhance their core capabilities to deal with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2. What kind of roles could governments play to foster innovation?
3. Should government focus more on improving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4. How could government support firms in identifying innovation impediments and in exploring appropriate solutions?

與談人發言重點

Tze-Chen Tu(杜紫宸)

1. 過去台灣在推動高科技產業時，因為有大量國外留學人才回國，帶回先進知識、技術以及具效率之工作模式，促進產業升級，帶動台灣高科技發展，成為高科技產業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環節。
2. 台灣近年國內高等教育機構林立，出國留學人數驟減，透過優秀人才回國，引進創新科技的效益刻正遞減中。
3. 目前中國大陸正受惠於大量國外留學人才回流效益，科技技術創新能量強大，加以中國大陸政府透過國內龐大內需市場，積極推動產業供應鏈在地化，未來勢將影響亞洲高科技產業各供應鏈角色的轉變。

Reiko Aoki

創新可以從兩個層面來進行，一個是產品本身與生產製程的創新，一個是研究機構內的破壞式創新。

1. 建置全球人力資本累積與循環機制

- (1)過去我們以為人力是最不容易移動的，隨著科技進步，人力已可配合需求進行跨國移動，一國可透過移民，引進短缺的特定技能與知識人才。現在透過ICT技術，也可跨國提供技能，不需實體移動。可是促進全球技術創新的長久之計，應該是要以全球或區域的角度，來投資人力資本與知識，促使所有成員受惠。
 - (2)短期作法，可透過增進工作者與學生的跨國交流，達到創意與知識的多元化，這種溝通有助於讓供應鏈更加有效率。如:各大學間的雙邊合作協議，這類國際連結計畫涵蓋成員應包含教授、學生、研究人員等，歐亞雙方透過國際連結計畫，讓歐亞的研究人員聚集在一起共同研究，產生正向的研究交流與循環。日本教育部也為日本大學雙邊交換學生計畫提供資金補助。
 - (3)長期作法，建立人力資本累積的機制，合作或調和部分教育系統(如: 哪些是必教的基礎數學與科學)，這將帶動更廣泛的教育創新。為兼顧多元性，合作或調和部分教育系統時，應兼顧國家文化特色差異化。
2. **供應鏈的知識與科技**：新產品與其零組件通常包含著多國的知識與突破發展。為促使創新者以外的人可以從新科技中受益，智慧財產保護與契約的規範是必要的。為利人員交流與學習新科技，完備技術移轉所需相關法規相當重要。
 3. **全球競爭政策**：競爭與創新是相伴隨的。競爭市場中創新成功，將獲利可觀。競爭市場內包括供應商、買家、生產者、消費者等。當競爭市場參與者分布不同國家，一國的競爭市場，對該國居民(包括廠商、消費者)有利，卻未必對其他國家參與者有利。透過協調全球競爭政策，將有助解決該問題。雖然目前全球經濟議題並未敘及全球競爭政策議題，未來可在全球經濟議題中納入競爭政策，如在貿易協議納入智慧財產權。比如「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已經成功調和智慧財產權，促進全球企業持續創新。

Hilo Chen

1. 透過了解終端消費市場客戶需求，提高創新價值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2011年歐債危機，造成全球經濟不景氣，壓縮傳統生產製造廠商獲利空間，全球供應鏈企業積極謀求創新商業模式。企業了解到真正有效創新價值係建立在終端消費者客戶的需求與回饋，於是轉變策略，重新評估商業模式，找出核心競爭力，重新定義客戶，透過了解原客戶的終端消費客戶，掌握市場趨勢，轉型成為創新型企業。

2. 網路科技帶來改變

網路科技提供了破除時間（24小時）與空間（跨國）藩籬的全方位服務平台，同時也提供了連接全球供應端與消費需求端的即時回應服務。這樣的創新，帶動各式創新創業公司快速崛起壯大，對傳統企業造成威脅，

促使傳統產業亦急迫應用網路科技，提升服務，進行轉型。

3.大企業轉型策略

- (1)建置特殊客製化服務平台：發展供給端與需求端互動生態，提供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加入合作。大企業位於全球供應鏈上游角色，若能建立加入特殊客製化服務平台，吸引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加入合作，將有助於利用網路科技，串連供應生產符合消費端需求的商品。
- (2)讓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成為企業創新價值之一環：中小企業與新創企業具有針對特定問題需求，快速提供解決方案的能力。在大企業建立的供給者與需求者互動生態中，應鼓勵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創新服務，並納入成為大企業發展高值化獨特服務供應環節。
- (3)建立核心競爭力：為成功扮演價值鏈之串連，供應鏈與需求鏈之銜接，大企業應積極轉型，投資發展價值鏈中所需之核心競爭力，包括透過購併等，確保創新商業模式的成功運作。

4.政府可扮演角色

為促使企業朝創新價值發展，政府可創造國內市場需求來支持，透過BOT案與大企業合作，以及創新獎勵措施，鼓勵中小企業及新創企業加入大企業建置的供給端與需求端互動生態體系。俟國內市場發展成功後，可進一步進行跨國合作。

5.案例分享

在此以台灣捷安特(Giant Bicycles)的成功案例加以說明。捷安特重新定義其客戶為腳踏車使用者，非僅限於國際腳踏車大廠，已漸從腳踏車國際製造大廠代工(OEM)角色逐漸轉型。2009年，台北市政府運用BOT(Build-Operate-Transfer)模式，將台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YouBike微笑單車)，委託捷安特經營。YouBike從使用者需求出發，提供使用者輕鬆且快速加入使用會員、便利儲值、全天24小時可租借等便利服務；並運用先進技術，無線射頻辨識系統RFID科技，即時獲取腳踏車被使用的資料(Big Data)，送回營運中心，快速控管台北市各區腳踏車數量的均衡配置；使用者也可透過手機app查詢各區腳踏車的配置狀況，就近獲得可使用的腳踏車。YouBike透過使用人口擴增，直至第7年才開始獲利。本案我們看到BOT模式讓政府與廠商獲得雙贏機會，也看見下一代技術的創新價值，貼近使用者需求，並打造友善地球的健康生活型態。

DoHoon Kim

1.新型態全球供應鏈模式中的廠商應能與對手既競爭且合作

- (1)我們可以看到歐美商品主要來自亞洲製造輸出，亞洲製造國家又以日本、韓國、台灣、中國大陸為主。四個國家表面上在製造供應上呈高度競爭，實際上，競爭的同時也帶動了供應鏈夥伴間的緊密合作。
- (2)韓國的企業文化具有強烈的競爭意識，對外方面，15至20年前，韓國大企業透過不斷地整併，以跟日本大企業拼出高下，競爭領域包含汽車

業、電子產品、化學業等。對內方面，韓國大企業也擅長於整合國內當地供應鏈，跟當地中小企業簽署合作契約，提供發展創新的機會。近年來韓國大企業開始往中國大陸發展，除了看中其龐大市場商機外，也開始尋找中國大陸當地的零組件廠做為合作夥伴，搭起中韓產業供應鏈合作關係。

(3)從零件與材料的貿易流量與流動方向，我們可以發現全球供應鏈的變化，日本對於南韓、中國大陸皆有貿易順差。近年來，日本與南韓企業皆到中國大陸設置工廠，並以中國大陸當地的零組件廠商為供應商，我認為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未來也會整合進這類的供應鏈關係。這種供應鏈當中的廠商，彼此之間處於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因此，新型態的全球供應鏈運作模式，供應鏈的各國廠商必須學習如何和對手既競爭又合作。

2.亞洲供應鏈廠商除在生產製造合作外，亦應在R&D技術合作

(1)通常零組件與材料廠商（companies specialized in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以下簡稱CSCM）多為中小企業，並仰賴與大型銷售商合作（companies specialized in final consumption goods，以下簡稱CFCG），以加入全球供應鏈中。

(2)有關增進供應鏈廠商R&D合作，政府可以從促進CSCM間的創新合作開始。作法包括：提供CSCM廠商名錄給全球貿易商，增加CSCM在全球供應鏈曝光度，減少對CFCG的依賴；協助CSCM在主要跨國技術上，進行標準化，並取得共同認證，以利爭取CFCG委外訂單；推動CSCM跨國聯盟，降低對市場壟斷或技術外流的疑慮；提供CSCM與大學機構及政府智庫針對R&D合作的機會。

Rong-Ping Mu

- 1.創新的本質是一種價值創造過程，包含科學、科技、經濟、社會、文化價值的創造過程，不同的價值創造會有不同的活動，而不同的活動需有不同的政策輔助與規劃。
- 2.政府可從活動、成員、資源等三個面向，來思考如何制定創新政策。活動包含科學研究、產品製造、商品化等，成員包含政府、研究機構、大學、企業等，資源則包含資金、基礎建設、網絡等。
- 3.隨著網路科技的發展，去除了國家藩籬界線，對全球供應鏈帶來改變。因此，各國應先釐清自身國家的優勢與劣勢，產業的強項與弱項，依據該優劣分析，進行創新政策決策。
- 4.以中國大陸為例，產業弱項如：大型企業產業化衝擊環境，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量不足等，產業強項則為大量創業家崛起等。在創新政策上，政府應善用該優勢，鼓勵新創事業發展，進行科技R&D，提供足夠資金支持創新。



2014年9月8日台灣團隊擔任「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分場主辦

五、其他分場座談

(一) 分場座談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Investing in Asia – Cyclical or Structural Growth Slowdown?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0 時 30 分至 11 時 45 分
地點	Room “Kedah”, The Shangri-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持人 (moderator)	Debra Mao , Taipei Bureau Chief, Bloomberg News, Taiwan
與談人	Ravi Chidambaram , President, TC Capital, Singapore Sim Lim , Group Executive, DBS, Singapore Charon Mokhzani , Managing Director, Khazanah Research Institute, Malaysia Saqib Rashid , Director, Abraaj Capital Group, Singapore Geoff Riddell , Member of the Group Executive Committee, Zurich Insurance Group, Hong Kong
會議紀錄	蔡瑞娟

討論題綱

1. Is it clearly structural or cyclical or is it a co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2. Asian countries assert that they can avoid a full-blown crisis because they now have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sounder banking systems, and do not have large debts denominated in USD. Is this sufficient?
3. What are the “second-generation” reforms most needed to spur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4. In terms of development, what matters most – the level or the rate?

重要論點

中國大陸經濟

1. 中國大陸經濟成長走緩，執政當局正推動經社結構改革，各界多看好中國經濟前景。至於一胎化可能引發的人口及勞動力問題，由於農村地區仍有大量勞動力可移入城市，中共領導人將有時間處理因應。
2. 中國大陸經濟明顯轉變中，已不再為低附加價值製造業出口導向的國家；2014 年服務業產值首度超過製造業，預期未來三十年將續漸朝服務業發展。新興產業蓬勃發展，科技網路業不僅將推升大陸經濟，亦將影響全球；醫療業近年大幅自由化，吸引海內外資金。西方媒體漸認為中國大陸對外人直接投資 FDI 不友善，但此說僅限於中國大陸想創造自己的國家龍頭產業

(national Champion)時，在許多業別領域的招商活動仍熱烈進行中。事實上，中國大陸正靈活地定位自己在新產業的角色。

3.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諸多社會問題，尤其是勞動力移轉與流動所產生之壓力與挑戰，處理不當會影響經濟，亦不容忽視。
4. 中國大陸欲吸引外資投資仍有多項重大障礙待克服，包括：法規透明度、官僚貪汙、健全債券市場，以及人民幣國際化等。
5. 中國大陸的企業違約及壞帳問題並不算嚴重，即使是較敏感的國營企業破產，案例顯示當局將審慎處理，無須太擔心。影子銀行則是當前大陸經濟最大風險因素，資金無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利率需逐步自由化。中國大陸的金融業相對落後，專業人員不足，但正快速學習中，相信適時中國大陸將出現類影子銀行功能的金融或非金融機構。
6. 私募股權投資 (private equity, PE) 在中國大陸的投資額 2014 年為 200 億美金，約占全亞洲的一半。PE 為利潤導向，而國營企業企多半負債、管理差且不具競爭力，除非政府進行重整，國營企業將非 PE 的標的物。

印度經濟

1. 今年五月印度大選結果，由主張改革的莫迪 (Narendra Modi) 出任總理。主張經濟優先的莫迪勝選，國際輿論及投資者多抱以樂觀預期，Moody's 信評機構旋即調升印度的國家評等為 Baa3，印度股匯市亦有佳績。
2. 印度雖潛藏龐大投資商機，但落後的基礎建設、法規障礙，及政府效率等一直為外商詬病，政策面有許多待改革之處。舉如都市化政策，取消燃油補貼，所造成鄉村地區通貨膨脹，主要源於農產品價格攀高。以補貼政策保障民眾基本生活並非長久之計，應採福利政策。至於可在印度投資的領域，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3. 印度面臨雙赤字危機 (經常帳赤字與財政赤字)，國家資源不足，無法如中國大陸以擴張性財政政策達高經濟成長率，亟需借重外資力量，故加速法規鬆綁為當務之急，近期印度政府宣布外人投資印度保險業之持股上限，將由現行 26% 放寬至 49%，即在吸引外資，但規定投資股權超過 26% 之案件需經外人投資促進委員會專案審核，外國保險公司的經營權仍受一定限制。
4. 印度政府選擇性的產業發展政策，缺乏長遠規劃。通信業頗為成功；至於發電業，政府大力鼓勵民間投資獨立電廠 (IPP)，在部分地區確有助於紓緩供電不足的問題，但在部分地區也產生過度投資不符經濟效益的現象。
5. 摩根士丹利預測，至 2025 年全球新增勞動力的 25% 將來自印度，印度雖有此人口優勢，但無法保證國際資金一定會在印度落腳，仍將視勞動力的素質及其他配合條件而定。

印尼經濟

- 1 印尼為東南亞第 1 大經濟體，但 2013 年聯準會暗示將縮減購買公債時，國際資金大舉流出重創印尼，此主因印尼經濟體的結構性因素，而非循環因素。印尼現經常帳與財政收支均呈赤字，而對國內燃油的補貼，更惡化財政赤字。
2. 印尼政府近年來一直試圖削減高額燃油補貼，去年 4 月曾提出削減方案，但引發全國性抗議，最終被國會否決。印尼新當選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的競選承諾包括大幅刪減能源補貼（預算支出中最大的項目），將此樽節資金用於基礎建設、醫療及教育投資，但此將面對一系列的艱鉅挑戰。
- 3 印尼的天然資源條件優厚，特別是擁有豐富的煤礦、石油及天然氣等能源，且極具發展再生能源的潛力，但由於能源政策失當及能源部門經營差等因素，致油價相對較高；政府亟需改革能源補貼政策，發展再生能源，並整頓煤礦等能源部門。
4. 印尼人口近 2.5 億，約一半在 30 歲以下。人口年輕化，除提供充足的勞動力外，也創造了國內消費需求，為印尼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外，相對廉價的充足勞動力也將成為吸引外資的亮點，帶動資金流入。

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1. 東協將於 2015 年成立資金、技術人員可自由流通之經濟共同體 此為東協結構改革之一環，預期區內貿易將大幅成長，經濟前景樂觀 但東協金融服務業的自由化推動難度高，因各國所得差距大，不易有一致性的相關法規，無法達到類似歐盟的結盟關係。
2. 但東協各國間已具高經貿互動關係，舉例來說，新加坡為全球重要對外投資國而東協地區則為新加坡的前五大資金目的地，泰國 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對越南 寮國 緬甸 高棉等相對落後東協國家已有相當投資，此有助其經濟發展，但東協地區沒有類似歐盟的經濟結盟關係。
- 3 對於如何限制流入東協地區追求短期利益的熱錢，無論來源國為何，建議可採對短期資本利得課稅方式因應，舉如智利前所課徵的 Tobin Tax(1991-1998)
4. 區域內的資金流動不一定全是負面影響，如果因資金流促使亞洲經濟蓬勃發展此亦將有利於全球經濟發展，反之亦然，重要的是各國要做好本身的內控 (house keeping) 工作。
5. 目前東協國家的處境頗似於 1960 年代的美國，人口平均年齡約 28 歲，人口依賴比下跌，勞動力增加，但如果基礎建設 教育及法規未有適當配合下 此人口紅利可能轉為人口負擔，但東協善用人口紅利而成功機會還是很大的。



2014年9月7日「Investing in Asia - Cyclical or Structural Growth」
分場座談照片

(二) 分場座談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Creating Virtuous Talent Triangles for Labor Migrants: An Asian Perspective 建立移工的良性人才三方關係：亞洲觀點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2 時至 13 時 15 分
地點	Room “Perak”,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Conny Czymoch , International Moderator and Journalist, Germany
與談人	Dovelyn Aguinas , Senior Policy Analyst, Migrant Policy Institute, USA Jorg Drager , Member of the Board, Bertelsmann Stiftung, Germany Yuko Hamada , Senior Regional Labor Migration/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Specialist, IOM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ailand Andreas Schneider , Deputy Country Director, GIZ, Vietnam
會議紀錄	賀麗娟

討論題綱

- 1.This session unpacks the complexity on creating virtuous talent triangles for labor migrant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Asia, how are migrants gaining or losing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current “migration game”?
- 2.How can intergovernmental initiatives work to create a fair deal on talent?
- 3.Which practices can create virtuous talent triangles, such as pre-departure training, diaspora guidance and bilateral agreements on labor migration that strengthen the rights of migrants?
- 4.How can receiving countries create fair pilot projects for fostering labor migration?
- 5.Which role does civil society have in the push toward triple wins in the migration game?

主題說明

移民與人口趨勢變化快速。南方遷徙到南方的重要性已經變得和遷徙到北方一樣的重要。在人口老化與減少的地區，人才庫已越來越小。然而遷徙的結果有許多種，可能受到許多因素影響，包括不限於移民權利的規定，移民的準備程度，或語言能力。在中期的人才競賽中的贏家，將只有可能是，如果競爭國家非零合競賽，意即他們要記住招募移工產生超越其邊界的後果。良性的人才三方關係，係指主要利益相關者，創造三贏：移民，移出國家和移入國家。亞洲已經面臨挑戰：許多人承諾改善移民者的權利及鬆綁勞工流動，例如可倫坡程序及阿布達比對話。各國政府已經開始採取措施，為出國的移民做生活及工作上的準備，移入

國也一樣，以協助新移民融入其新家園。例如辦理出發前課程及新移民的適應方案。再者，國際上，國家的及非政府的利害關係者，開始努力改進移民的範圍、本質及結果等方面的有效數據。

本會議係為解析移工問題中，創造良性的人才三方關係。主要聚焦於亞洲，移民在目前的「移民競賽」中，如何獲得或失去？政府之間如何合作，以創造公平的人才交易？哪些做法可以創造良性的人才三方關係，如移工出發前的培訓、僑民指導原則及雙邊協議，可強化移民者的權利？移入國如何創造公平的先驅計畫以促進勞動力流動？在移民競賽中，民間團體在推動三贏中所扮演的角色為何？

與談人發言重點

(一)Yuko Hamada

亞洲國家是勞工輸出國也是輸入國，約有 2 千 5 百萬人到海外工作，其中約有一半是從南亞國家到其他國家，專業技術勞工到北美或歐洲，較無技術者到東南亞國家，例如到新加坡從事家庭傭工、馬來西亞從事無技術工作等。以斯里蘭卡為例，送出 4 百萬勞工到其他國家工作，因此，移工問題在亞洲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海外就業服務亞洲協會(Asian Association of Overseas Employment Service Providers, AAA-OESP)為可倫坡機制成員國(Colombo Process Member States)¹加強了解良好招募的做法，並提供以產業為導向的良好招募工作。AAA-OESP 致力於促進良好與專業的招募做法，為雇主及移民提供可信賴的服務，消除非法招募、移民與人口販賣。

亞洲許多國家開始討論臨時移工問題，因為可倫坡成員國有大量的人民，到全世界不同地區尋求就業機會。2008 年，可倫坡成員國約有 5.4 百萬移工透過官方管道移民，2005 年時只有 2.7 百萬人。這個數量還在成長中，全球化也提供新的機會與連結，國際間的勞動力流動已達到新高，移工相關問題也變得非常重要。

各國面臨的挑戰，主要是為確保移民制度的效率與公平，以促進所有參與移民流程中的利害相關人最大利益，這些挑戰需要以有管理的招募因應。

移工在輸出國的移民流程階段，就開始被剝削。在可倫坡成員國，有證照的仲介持續向移工額外收取仲介費，或其他未被核准收取之費用。移工仍常面臨詐欺問題，並被非正規的仲介控制。如此使移工落入被剝削的循環中，也更易被國外雇主掌握。更惡化的情況是他們不易得到司法、福利及社會保障。

¹可倫坡機制成員國成立於 2003 年，是部長級會議磋商海外就業和勞動契約，其目的是提供一個論壇，亞洲勞動力輸出國到海外就業的分享經驗和最佳實踐等。成員國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印度、印尼、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和越南

無論如何，不只有移工面臨不良管理招募產生的問題。也會損害輸出國與輸入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虐待與剝削案件會得到媒體密切的關注。

為移工、輸出國及輸入國，促進與實踐良好招募，AAA-OESP 的成員，包括來自 10 個國家的招募或僱用機構，於 2014 年 4 月 2 日簽署追求良好招募的聯合聲明。根據這個聲明，該 10 個國家承諾依據國際勞工組織(ILO)及國際公約實施良好的招募與將其專業化，各產業協會應了解其為會員發聲的重要性，並同意強化輸出國及輸入國的政府、雇主、移工間在招募行為上的夥伴關係。

為促使移工問題的三贏，建議由國家代表參與由招募仲介及其他利害相關者召開國家級會議，以落實與追蹤前述承諾。這些會議應強調這些國家實施良好招募所面臨的挑戰，討論促進良好招募的方法(無論是透過採用新技術或嚴格法規)，並幫助釐清不同的利益關係者間的合作夥伴關係。會議中，招募機構可以起草計畫促進良好與專業的招募做法，提供雇主與移工可信賴的服務，消除非法招募、非法移民及人口販賣。國家行動計畫確立後，招募機構可以與政府、夥伴、移工、公民社會組織與相關的利害關係者協調。

(二)Dovelyn Aguinias

移民和移工是不同的，大部分移工只是想賺錢回母國養家，並不是真的想留在輸入國。私立仲介機構在移民的過程擔任許多協調工作，從移民出國前到返回母國之間。他們提供相關訊息、對有需要的移民提供資金協助；協助前往輸入國的交通；有時甚至直接僱用移民；也會為移民發聲，排除移民於虐待的場所工作，安排遣返。雖然仲介機構提供這麼多的協助，但是在跨越數個司法管轄區的競爭市場中，也創造剝削與虐待的機會。

許多違法事項多發生在收取費用及債務，有些移工被超收費用，有些則被鼓勵增加貸款，債務可使勞工離不開施虐的雇主，在勞工回國後還會產生一筆勞工負擔不起的調解費用。

仲介機構的管理，要用何種形式或功能，需要建立共識。目前的招募規定有幾方面要改進，首先，先考量對於招募過程的干預，是否太多或太少，應該取得平衡；其次，對於招募中的違法行為，可從資訊不對稱等考量；移工輸出國與輸入國家的政策無法配合，可能產生漏洞，使不法機構有機可乘。有效的管理，要求輸出國、輸入國、用人單位以及民間團體努力緊密合作，以便減少整個供應鏈的壓力。

(三)Jörg Dräger

德國從 1960 年代即開始開放移工，但是發展至今，仍然左右搖擺不定，不同的政府部門對於移工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勞動部門不贊成進用移工，另一個部門卻歡迎移工。根據一項研究推估，2050 年德國勞工將從目前的 4 千 5 百萬人降為 2 千 7 百萬人，因此政策將從過去較排外的方向，導向較歡迎移工。

不同的國家，面臨的移工問題不同，對於移工的態度也不一樣，例如加拿大認為移入的人才絕不可浪費，因此將移民與社會連結做得很好。制定移民政策需要許多數據證明，並將之視為人(human being)，而非只是移工，如此才可以產生

連結，對於輸出國及輸入國都會產生價值。移工牽涉到輸出與輸入雙方的制度，包括移工在輸出與輸入國的社會福利及退休制度等。在人才方面，遭遇最大的問題是工作媒合。



**2014年9月7日「Creating Virtuous Talent Triangles for Labor Migrants:
An Asian Perspective」分場座談照片**

(三)分場座談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The potential of 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4 時 15 分至 15 時 45 分
地點	Room “Kedah”,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持人 (moderator)	Henrik Muller, Chair in Economic Policy Journalism, TU Dortmund University, Germany
與談人	Muzzafar Hisham , CEO and Group Head, Islamic Banking, Maybank Islamic, Malaysia Christian Kastrop , Director of the Policy Studies Branch, Economics Department, OECD, France Baudouin Regout , Advisor and Head of Analysis, Bureau of European Policy Advisors of President Barross, European Commission, Belgium Dannuel Selter , Founder, Think Beyond the Obvious, Germany
會議紀錄	蔡瑞娟

討論題綱

- 1.What should an optimal 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 procedure include? 2.Are there approaches such as early warning systems or stress tests, which could serve as best-practice examples?
- 3.How can it be ensured that the broad variety of potential future crises are captured and that crises are forecast early enough to allow for sufficient counteractive policy measures?
4. How can policymakers react most efficiently to alerting signals from 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 procedures?
- 5.How can we ensure that policy measures do not end up fighting symptoms rather than the underlying fundamental problems?
- 6.How can concrete policy measures to counteract imbalances and potential crises be globally coordinated?
- 7.Which ways exist to implement a coherent 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 procedure at a global scale?
8. Ar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IMF and the G-20 sufficient?

重要論點

全球經濟仍處於槓桿化過程(Leveraging Process)

1. 國際清算銀行 BIS 最近資料顯示，已開發國家公私部門合計債務占 GDP 比率仍高達 218%，與 2010 年歐債危機最嚴重時相近，因此無法說現階段在進行去

槓桿化，甚至一些新興國家有進一步槓桿化的現象。我們是否已由此危機中學得教訓，或正邁入另一場混亂中？同時，歐元區經濟似正瀕臨衰退，市場上出現類似 1930 年代的 depression 現象，即國民所得縮減與物價緊縮並存。

2. 為提振歐元區經濟 ECB 總裁德拉吉於今年 9 月 4 日宣告，10 月起將啟動歐洲版的量化寬鬆 (QE) 行動，即收購資產擔保證券 (ABS) 與擔保債券，刺激歐元區信貸需求，此舉類似美國、日本及英國之前的量化寬鬆政策。英美日這些未經國際協調的寬鬆貨幣政策，造成國際資金流動性劇增，多流入亞洲、美洲等新興市場，亞洲國家抱怨基本上他們已喪失對貨幣的控制權，西方國家則表示他們對資金流竄亦無能為力。

總體經濟監理(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的必要性

1. 根據傳統經濟學觀念，追求經濟穩定應由國內開始(starts at home)，由個別國家著手的效果勝於訴諸國際層面。
2. 由於全球經貿體系的連動性日益增強，外溢效果加大，不能僅由一國立場思考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國家的問題很容易轉變成全球性的問題。舉如美國寬鬆貨幣政策退場的效應，即為一國政策可能對全球經濟創造明顯外溢效果的例子。因此，總體經濟監理系統是必需的，全球總體經濟環境應被嚴密監測，政策制定者應掌握市場情況，並實施適當的政策措施，而首要之務為強化一國經濟體質，此為有效總體經濟監理的核心。
3. 總體經濟監理將引發政治經濟上的同儕壓力。如一國參與政策協調，國際組織將提供支持與各種協助，或專業技術諮商。此不僅純為經濟需求，亦有政治經濟層面的考量。
4. 國際間已有許多總體經濟監理相關機構或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IMF)、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亞洲開發銀行(ADB)、歐盟(EU)、各國央行、政府及民間智庫等等。但即使專家們提供諸多建言，政治人物基於政治考量，如尋求連任，還是會選擇選民最喜歡，但不一定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5. 本場次引言短片述及由最近的債務，貨幣或金融危機，已證明難以預測此類事件的發生。實際上，藉由蒐集相關資料，建立監測指標及預警機制，風險是具有可測性的。此次金融危機後，歐元區已對所有歐盟會員國提出以指標計分表(scoreboard of indicators)為基礎的預警機制。

總體經濟監理的運作

1. 總體經濟監理的內容包括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銀行監理、總體審慎(macro-prudential)、經常帳、金融機構監督等等。
2. 總體經濟監理是解決很多當前許多總體經濟挑戰的關鍵。然單純的監督是無效的，除非落實和執行所需的政策的後續行動能迅速介入。

3. 有效總體經濟監理攸關協調與合作，除技術層面外，應考慮各國的利害關係人、文化及傳統不同等因素。因此，國際協調與合作應為有效總體經濟監理的重心。可藉由召開國際論壇等方式，降低彼此合作的障礙。
4. 針對多數國家債務持續增長問題，Mr. Selter 建議，步驟 1：監控並限制信貸增長。研究顯示，政府債務占 GDP 的 50%-60% 為可持續發展的水準。因此，政府及非金融機構的民間部門的債務增長最好以 60% 為上限，一旦債務增長高於某個門檻，須啟動第一道煞車器(the first brakers)，愈接近 60% 的門檻，因應措施應更嚴格。步驟 2：建立貿易盈餘和赤字的國際清算機制，透過市場，競爭和總體經濟力量，間接限制一國的國際收支的盈餘和赤字；在各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廣泛支持下，國際清算銀行可以扮演此監督者的角色。
5. 由於不相信單一國際監督機構能同時扮演監控者及處理失衡問題的角色，Mr. Selter 建議快速發展標準化的政府破產過程，以及以債權人參與為主的銀行破產。以提高對金融市場的謹慎度，降低道德風險，此種信號發揮的作用可能比非強制執行的國際條約更有效。
6. 經濟政策的整體戰略及有效執行，成功關鍵為對總體及個體資料監控。Mr. Hisham 針對確保主權/區域政策有效執行的最佳資料處理方式，由三面向提出建言：國家和區域關鍵的經濟基本目標、國家目標和主要金融機構首席經濟學家間評論的平衡，以及運用有效的投票機制(polling mechanism)，以監測和評估整個市場及民眾情緒。Mr. Hisham 建議決策者瞭解市場脈動的有效途徑之一，為藉由央行或財經部會召開會議，邀集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請他們提列當前重大議題清單並進行辯論，過程包括各種“壓力測試”的情境。此外，為瞭解廣大民意的想法，避免政策適得其反，須估量不同人口族群的意見和反饋，適當的民意抽樣也是很重要的。
7. 多數國家設有要達成的關鍵經濟目標，例如公共債務佔國內生產總值，通貨膨脹率，利率政策等。這些目標的設定，須由對國家及對區域的全面衝擊進行考量，Mr. Hisham 認為歐盟執委會於 2011 年 9 月所達成的政策共識，對歐盟境內的經濟治理提出包裹式的六件法案 (six-pack) 為最佳例子。東協國家亦應朝訂定東協地區共同經濟目標而努力。



2014年9月7日「The potential of 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
分場座談照片

(四)分場座談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Shaping a Free and Fair World Trade Order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8 時至 19 時 30 分
地點	Room “Perak”,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Petra Pinzler , Berlin Correspondent, DIE ZEIT, Germany
與談人	1.Richard Baldwin ,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2.Andreas Esche , Director of the Shaping Sustainable Economies Program, Bertelsmann Stiftung, Germany 3.Renato Flôres , Professor, School of Economics of Fundacao Getuilo Vargas, Brzail 4.Gabriel Felbermayr , Director, Ifo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Germany 5.Pascal Lamy , Honorary President, Notre Europe – 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France; Former Director-General, WTO 6.Gita Wirjawan , Founder, Ancora Foundation, Indonesia
會議紀錄	邱莉婷

討論題綱

- 1.A fair world trade order be restructured in an era of bilater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to make sure the south is not put at a systematic disadvantage?
- 2.How can regional initiatives and integration efforts be “domesticated” to have them support the multilateral process rather than hinder it?
- 3.How should the WTO be reformed in order to accompany this process in a compatible and complementary way?
- 4.Which actors and procedures are key in shaping this process in a legitimate way?

重要論點

- 1.區域經貿整合崛起，帶來區域內巨大的經濟利益，但可能擠壓了開發中國家的生存空間；新興國家彼此間雖可建立合作機制，但障礙仍多：
 - 過去 20 年區域貿易協定急遽增加，自 1995 年世界貿易組織 (WTO) 成立以來，根據關稅暨貿易總協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之規定註冊下，全球已超過 400 個區域貿易協定。
 -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PP) 或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 (TTIP) 最近的推動進度，已遠遠超越傳統的貿易協定的規模和深度。這些協定試圖處理政府採購、私人訴訟等具爭議的問題，嚴然形成了新一代貿易協定。
 - 區域自由貿易區的版圖不斷拼湊，正挑戰多邊協定 WTO 及多哈回合 (DDR)

談判的發展，這樣的趨勢具有重新分配資源的意味，並出現政治影響力的較勁情況。

- 區域經貿協定具有經濟及政治上的綜合性，任何國家主導或規劃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亦即主導或參與了巨大的經濟利益。
- 區域經貿關係將產生的貿易轉移效應，不利非成員國。先進經濟體因而自發展中國家或南半球國家獲利，可能導致兩者的經濟差距擴大。結果可能使全球經濟進行潛在的轉變，形成對多數發展中國家及南半球國家系統性的歧視。
- 區域整合如 TTIP、TTP、RCEP 主要涵蓋範圍多以北半球大型經濟體為主，對於新興國家或南半球經濟體而言難免有所影響。以巴西為例，雖為南方共同市場（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委內瑞拉和巴拉圭等）一員，但尚未進入實質議題；因此巴西目前係以 WTO 多邊架構體系，作為與其他成員的交流平台，未來，也不排除透過加強 BRICs 金磚五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或聯合拉丁美洲國家智利、秘魯等，形成新興國家的區域合作。

2. 區域經貿協定對內整合盟友的資源、深化彼此經濟活動的連結，對外帶動非成員的改變，間接調合非關稅以外的制度面規範；深化的區域協定，帶來的是軟性的「歧視」，潛移默化地對區外的成員帶來了正面的外溢效果：

- 20 世紀區域貿易協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大多具有關稅優惠。當時的思維認為區域貿易協定是集結了一群重商主義的盟友，彼此享有貿易優惠及貿易轉移效果，對非盟友則以關稅隔絕部分商品的往來，當時的舊思維總認為只有區內才具有利益。
- WTO 已降低多數的商品關稅，當然部分敏感性的貨物關稅仍然很高，進入 21 世紀，區域經貿整合協定的內涵，不是傳統上所認為著重關稅的降低，因為過於敏感性的貨品還是不會列入協定；也不是刻意要對其他非成員築起一道歧視的高牆，而是試圖整合、融合區域內成員國的金融、法規、資本及智財權等，為區內帶來更流暢的合作關係。
- 在全球化下，許多企業或商品，由於「國籍」及「原產地」之類的定義越來越模糊，若要對於區外形成刻意的歧視，也具有技術上的困難。因此，21 世紀的 RTA，主要目標是整合企業、服務、資本及智財權有關規範，而非刻意造成區外的歧視。
- 非成員為了與區內交流、融入區內的供應鏈，不得不強迫自己遵行區內的遊戲規則，因此，區域經貿協定，對於非成員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果，將顛覆傳統上所認為「區內受益、區外受害」的思維。瑞士就是明顯的例子：20 世紀最大型也最深化的協定—歐洲單一市場，瑞士為了要與歐盟國家往來，就得強迫自己改變、遵守歐盟的遊戲規則，然而這樣的改變也帶來了轉型的契機。
- 區域協定的關鍵問題，不在於誰要參加，而是在於「誰」主導了區內規範走

向？這些多邊的規則的代價與利益是什麼？

3.區域經貿整合對新興國家帶來了利益，加速新興國家參與全球供應鏈的活動，先進技術的企業將僱用新興國家的勞工，進而提升勞工的效率及福利：

- 一般人對區域協定的誤解，還包括「對富有國家比較有利」的說法，基本上，不管是 TPP 或 TTIP，都是不算是傳統上的貿易協定，反而比較像是離岸的協定：不是要對國內帶來衝擊，而是所建立的規則，是有利於協定成員間的生產活動，也就是透過國際生產網絡的合作，促使彼此的製造或產業分工變得更為便利、流暢或提升效率。如此一來，也使得富裕國家與低工資新興國家，在高新技術的合作方面，進行交流與整合，帶動新興國家的就業、加速新興國家融入全球供應鏈。
- 成功融入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成長應會非常迅速，那些具有先進技術企業原來在自己的國家即具有相對利益，在全球供應鏈整合下，促使企業得以充分運用外國及本國的勞動力，進行融合或交流，如此看來，新興國家的勞工肯定第一輪的贏家。



2014年9月7日「Shaping a Free and Fair World Trade Order」
分場座談照片

(五)分場會議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Addressing Inequality 解決不均問題
時間	2014 年 9 月 7 日，18 時至 19 時 30 分
地點	Room “Selangor I”,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Marshall Auerback , Director of Institutional Partnerships,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USA
與談人	Amar Bhide , Thomas Schmidheiny Professor,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 USA David Howell ,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The New School for Public Engagement, New York, USA Phillipe Legrain , Writer, Commentator and Political Entrepreneur, UK
會議紀錄	賀麗娟

討論題綱

- 1.Does wealth inequality rise inexorably under capitalism?
- 2.Or is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t the top not an autonomous product of “capital”, some natural law of economics which states that it will always produce growing inequality, but rather a product of specific policies which can be reversed?
- 3.If global circumstances and national policies were largely at fault, is it the case that policies change, can the rise of inequality be stopped?

主題說明

Thomas Picketty 對於所得與財富不均方面的論述，引起正反兩方非常大的爭論，因其論述威脅到傳統經濟思想的「一般均衡」理論。大部分經濟學家在考量分配問題時，選擇強調效率，忽略財富和所得不均問題。依據資本主義運作的本質，擁有大量資本者之運用效率較無大量資本者佳。

政策要處理的問題是在資本主義下，是否擴大了財富不均？依據經濟學的一些自然法則，通常會產生越來越嚴重的不均問題，透過某些政策可以逆轉此問題嗎？如果全球環境與國家政策大部分是錯的，改變政策可以停止不均擴大嗎？

與談人發言重點

(一) David Howell

針對不均問題，應先釐清不均的相對對象是誰，不均對經濟的影響為何。所得不均與工資不均，二者不同，美國面臨極端的不均，高所得者以前所未見的速度快速增加所得，低所得者則是所得停滯，甚至減少。對於低工資勞工，最直接、

有效與公平的解決方式，透過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使領取低工資的勞工可以過好的生活，許多國家與歐洲國家過去近 10 年已開始如此做。

本次會議的重點是針對 Piketty 最近出版「21 世紀資本論」，探討在資本主義之下，財富與所得不均增加的程度有多少？Piketty 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富有世界是某種「世襲的資本主義」，至少美國及法國是如此。

但是 Piketty 也了解，美國許多的所得不均，與其說是因為資本報酬，不如說是因為賺取的收入不均，在 CEO 及財務部門主管的薪酬扶搖直上的同時，勞工的所得停滯，甚至減少。主流觀點認為，是技術科技變革(需求面)及技術勞工缺乏(供給面)造成的，Piketty 則稱此為「邊際生產力」(或稱為技術與教育間的競賽)故事，他並不同意此觀點。

邊際生產力理論的主要問題是太簡單，無法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工資分布的多樣性。為了解工資不均的動態，我們必須納入其他因素考量，如每個社會中的勞動市場運作的制度和規則。勞動市場不是由抽象的數學可計算，其運作完全由天然的和不可改變的機制，以及無情的力量所決定：它是根據特定的規則和妥協所建構的社會。工資的壓縮或上升，非常難僅以供給與需求解釋。

如同 Joseph Stiglitz 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提到的，Piketty 將領取最高薪資與獎金部分，歸因於「租稅」-係指因為市場的不完善產生的議價能力優勢的結果。在勞動市場的另一端，Piketty 強調勞動市場機制對工資產生的影響，特別是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毫無疑問的，最低工資對於工資不均的形成與演化，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法國和美國的經驗，Piketty 指出法國與美國最低工資的實質購買力有鮮明的對比，法國在 1960 年代後期開始強烈上揚，美國則比 1960 年代低得多。Piketty 指出，一般人們，包括正統的經濟學家，越來越了解，制定法定最低工資，對於工資底部的勞工產生很大的影響，也可使勞動市場更有效能與公平。

(二) Philippe Legrain

所得與財富不均的情形，隨著時間變化，各國的發展狀況也不同，很難說這些不均的情形只是因為資本主義。產生不均的因素包括：經濟、技術、社會與政治，尤其是政府的政策。而 Piketty 提出以全球財富稅，做為解決不均之方案，是不可取和不可行的。不可取的原因：因為它無法分辨「實至名歸」的所得與財富，它們是透過創意、努力工作及在競爭市場中承擔風險賺取的，而這些都應該被鼓勵；儘管賦稅有累進基礎，所得與財富是透過經濟租及大筆遺產所累積，則被視為「不當」。不可行的原因：因為不可能全世界所有政府，同意一個全球性的財富稅；如果只有一些政府採行這樣的稅制，金融資本將移動到低賦稅地區，如此則無法達到此稅制之目的。廣泛來說，過度的不均是一個複雜、多層面的問題，不適合用銀彈策略解決。

Phillippe 提出從 3 個面向解決：

1、提升實質工資政策

大部分人的主要收入來源為工資，許多國家的工資成長陷入停滯，係因勞動生產力成長緩慢，勞工也無法因勞動生產力成長而調升工資；更糟的是，在全球化的經濟中，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但大部分的勞動力無法如資本般的自由流動，賦稅負擔反而越來越多是落在較無法流動的勞動者身上。

提升勞動生產力政策包括：加強投資教育、終身學習及相關基礎設施。廣泛來說，政策措施要使經濟更具活力與適應性，使被壟斷的市場(cartelized markets)可以更自由競爭，易於創業、易於重新分配勞動力以便更具生產力、並鼓勵創新。勞工提高生產力，應該得到獎勵，例如德國，過去 15 年以來，工資調升皆低於生產力的成長，因此，應訂定有尊嚴的最低工資。美國也應強化其勞工權益，削減勞動所得稅，以提升工資與就業。

2、處理「不當」財富來源之政策

除對不合理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課稅，更要盡量減少或消除之。經濟租的主要來源是利潤大、危險且不穩定的金融業，而且通常是佔據了他人創造的價值。許多改革是針對消除對債務賦稅之補貼，以減少危害社會。最好的做法是，取消利息、折舊的賦稅減免，而是讓企業在投資時可抵減稅。

其他政策措施包括：公司治理改革，以限制企業主的浮誇與不當給付行為；強化競爭政策，使被壟斷的市場可自由競爭；改革對智財持有者過度保護的智財權法令；鬆綁現行有利於財產所有權人的規劃與區劃法規。

3、向土地所有權及遺產產生不勞而獲的財富課稅

Piketty 認為在許多國家，增加財富主要是來自於資本。而建築物通常是貶值的，增值是來自於土地。土地會增值，並非因為地主，而是透過公共投資的基礎建設，以及周邊的企業和設施所創造的社會價值。因此，對土地課稅是公平的，並將之彌補對勞動的減稅。對土地課稅是有效率的，因為課稅不減少土地供給，土地是固定與不可移動的，無論是梅菲爾還是曼哈頓的土地，都不能被移到避稅天堂。**Phillippe 認為解決不均的諸多方式中，若只能選一個，他選擇以土地稅替代勞動稅。**



2014 年 9 月 7 日「Addressing Inequality」分場座談照片

(六) 分場會議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Islamic Finance
時間	2014年9月8日，8時30分至10時
地點	Room “Plenary Hall”,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Mohd Daud Baker , Chairman Sharia Advisory Council, Central Bank of Malaysia, Malaysia
與談成員	Khale AI-Aboodi , CEO, Islamic Corpo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ector, Saudi Arabia Kamarul Ariffin , CEO, Affin Islamic Bank Berhad, Malaysia Zambri Abdul Kadir , Chief Minister, Perak Darul Ridzuan, Malaysia Abbs Mirakhor , First Holder of the Chair of Islamic Finance,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Education in Islam Finance, Malaysia Ibrahim Turhan , Chairman and CEO, Borsa Istanbul, Turkey
會議紀錄	陳淑貞

討論題綱

1. Whether some Sharia-compliant instruments, are they truly so in spirit?
2. What innovations are possible within the constraints and respect of Sharia?
3. How can regional Islamic finance hubs like Kuala Lumpur connect and work with other global financial centers like London and Hong Kong to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and bolster innovation of this niche but fast-growing industry?

與談人發言重點

Mohd Daud Baker

1. Islamic Finance 近年隨著油元國財富累增，加以其依循阿拉真義及聖訓等原則，快速崛起成長。金融機構不從事投機，不投資賭博等違法行業，成為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另一個資金避風港，此外，其強調提供資金協助中小企業發展，不收取利息，風險共享，損益共享，有利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相較傳統銀行，成為金融機構新營運成長模式。
2. 馬來西亞近年建立許多有利發展Islamic Finance的法規，成為發展Islamic Finance最快速國家，目前股市及債市在伊斯蘭資本市場均屬全球最大，共同基金規模屬第二大，金融存放款服務規模則屬第三大。目前倫敦、杜拜、香港亦積極加入該穆斯林資本市場，爭取成為穆斯林金融服務中心。

Khale AI-Aboodi

1. Sharia是伊斯蘭法制架構，引領著穆斯林的生活行為。伊斯蘭鼓勵透過貿易，縮小富者與貧者間的差距。利息行為是不被允許的，為鼓勵實質貿易，非貿易活動，伊斯蘭會透過Zakat課稅，將該收入將用以挹注改善貧者生

活。

- 2.2012年沙烏地阿拉伯伊斯蘭債券發行規模約105億美元，為穆斯林市場第2大，僅次於馬來西亞456億美元。目前沙國伊斯蘭債券缺乏次級市場，且債券殖利率亟待建立，成為最大挑戰。
- 3.沙烏地阿拉伯政府財政充裕，為建立伊斯蘭債券(Sukuk)殖利率，於2012年1月首度由財政部發行伊斯蘭主權債券40億美元，發行規模為歷年最大，10年期，用以興建沙國第2大城市Jidda國際機場。

Kamarul Ariffin

- 1.損益共享是伊斯蘭金融的基本精神之一，以住宅開發投資案為例，若銀行同意投資，Affin Islamic Bank會與上市住宅開發公司新成立合資公司，作為特殊目的機構(SPV)，並簽訂Musharakah合資同意書，內容涵蓋合作目標、合作、雙方關係的規範與條件、以及Musharakah合作夥伴的責任義務等。登記與實收資本額度由雙方公司共同決定，會事前議訂雙方出資比例、獲利分享及虧損分攤比例等。
- 2.Affin Islamic Bank成立於2006年，為馬來西亞第1個提供Musharakah合資的伊斯蘭銀行，為因應國際伊斯蘭投資者需求，已設立國際貨幣事業單位，促進多元貨幣相關的金融交易，並吸引多元幣別存款。

Zambri Abdul Kadir

- 1.伊斯蘭債券快速成長，2014年迄今(9月)發行規模已達700億美元，主要係因穆斯林國家政府發行增加，其中，300億美元為政府所發行，預計年底將達1,150億美元規模。
- 2.隨著波斯灣油國與東南亞穆斯林國家貿易往來增加，貿易保險(takaful)及再保險(retakaful)需求越來越高，每年以30%成長率快速成長。一般傳統貿易保險風險承擔方式，不符伊斯蘭風險共享的精神，因此，越來越多保險及再保險公司已為伊斯蘭貿易保險量身訂做合適條款，以利爭取伊斯蘭保險市場。
- 3.馬來西亞在經營伊斯蘭金融領域起步較早，目前暫居領先地位，不過面對日益快速成長的伊斯蘭金融資產以及急起直追的競爭者(如：杜拜等)，馬來西亞政府將會持續完備伊斯蘭金融法制，並在實體經濟上，創新開發金融產品，除目前股權上市、債券發行、提供保險外，將持續強化資產管理服務。

Abbs Mirakhor

- 1.過去20年我見證了伊斯蘭金融發展歷程，面對諸多挑戰，快速因應持續成長。伊斯蘭金融秉持的救助貧窮，促進社會和諧，不投機、不貪取等精神，有別於一般傳統銀行，如今伊斯蘭金融機構已超過6百家，遍布75個國家。

2. 伊斯蘭金融服務禁止對借款或收款收取費用和賺取利息，伊斯蘭教規允許透過貿易和資產投資來創造財富，而非以錢生錢。有別於傳統銀行透過計息貸款維持營運，伊斯蘭銀行則以貿易、投資及提供服務，促進實際經濟成長，透過風險共享模式，共享盈利，共擔虧損。
3. 馬來西亞具多元民族文化，穆斯林人口占60%，有利於發展伊斯蘭金融。馬來西亞國會於1983年通過伊斯蘭銀行法令，陸續鬆綁法規，建置有利伊斯蘭金融發展環境，開放一般商業銀行得經營伊斯蘭金融業務，並允許外資100%投資伊斯蘭銀行，馬來西亞目前為全球最大伊斯蘭債券市場，其中CIMA 為世界最大伊斯蘭債券發行機構，熱絡的伊斯蘭金融，提供馬來西亞新經濟成長模式。
4. 能否活化所持有的資產是造成富者與窮者差異的主要原因，目前仍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貧窮者未能活化善用其所持資產，以致成為Dead Capital。伊斯蘭金融已成功透過農田合作夥伴、股本參與住宅興建與租賃等模式，協助農夫及無家者，將所持Dead Capital轉化為具生產力的資產。未來伊斯蘭金融應該在財務及經濟上，更強力協助穆斯林及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者，成功活化資產能力。

Ibrahim Turhan

1. 伊斯蘭金融在過去10年以12.5%成長率，快速增長，2012年底管理資產已達1.6兆美元，預計2020年達6.5兆美元資產規模。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投資者漸發現伊斯蘭金融相較穩健，在全球認為應減少投機投資概念下，伊斯蘭式的資產擔保融資結構，及連結經濟建設及資本市場的債券均再度被認可。
2. 土耳其高達99%均為穆斯林人口，對發展伊斯蘭金融責無旁貸，目前全球僅有20%客戶加入伊斯蘭金融體系，尚有80%潛在客戶待開發。不過，伊斯蘭金融上有許多待發展改進之處，包括：擴展其金融商品範圍、標準化金融法規、強化伊斯蘭金融人才培訓、增進對伊斯蘭金融之瞭解等。
3. 世界銀行已於2013年在伊斯坦堡設立伊斯蘭金融中心，目前伊斯蘭債券約有74%為馬來西亞及波斯灣區國家發行，來自中東發行約22%，考量伊斯蘭債券市場仍持續快速成長中，土耳其仍有成長潛能。

(七) 分場會議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The 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in ASEAN
時間	2014 年 9 月 8 日，13 時 30 分至 15 時
地點	Room “Perak”,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Jonathan Woetzel , Director, McKinsey & Co, China
與談人	1.Dino Djalal, Former Indonesian Ambassador for the United States (缺席) 2.Prasenjit Duara , Director, Asia Research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3.Eddin Khoo , Project Director and Founder, Pusaka, Malaysia 4.Marina Mahathir, Journalist, Malaysia (缺席)
會議紀錄	邱莉婷

討論題綱

- 1.How can the efforts of the majority to celebrate diversity rather than create divisions succeed? Should the divergence of cultures be avoided?
- 2.What roles must the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region play in recognizing the need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if the economic benefits are to be fully realized?
- 3.What are the current problems that hinder anyone from celebrating diversity?
- 4.Do we really need (and want) social and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is it the only way towards economic prosperity?
- 5.Where does ASEAN currently fail, where are problems to be expected, and are there already suggestions to how failure can be prevented?

重要論點

1.東協的整合最早是基於貿易與商業利益的結合，但社會、文化與宗教等因素，亦為影響整合進程的重要條件

- 東協 10 個成員國 2015 年正式成立的東協經濟共同體，對於亞洲來說，是一大進步。到目前為止，東協整合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和商業利益的假設，並將透過整合與資源流通、合作，帶來區內的日益繁榮。
- 整合的目標及期望相當偉大，值得努力，試想，該地區的人口預計到 2050 年從現行的 6.5 億人將成長至 10 億人，所展現的市場機會如此龐大。然而，除了貿易與經濟層面外，尚其他的條件影響整合的效率，包括社會和文化因素；另外，由於宗教常存在不寬容或不可接受等想法，難以相容不同信仰，使得經濟的整合埋下恐懼的種子。東協可能是目前唯一在世界上的具多樣性的文化及宗教可同時並存，也是東協最重要的特點，而必須強調這樣的特性。

- 基於長久的努力，東協的終於逐漸形成整合，除了應該慶祝具多樣性的特色外，應避免製造分裂，尊重彼此角色，各國政府和社區認識及培養社會和文化的認同，才能將現行利益發揮，並帶來區域的繁榮。促進社會和文化持續融合及同化，是走向經濟繁榮的唯一途徑。然而，應時時觀察干擾因素的出現，甚至提前預防，以防止合作的分裂或失敗。

2.東協應建立長遠發展的合作議題，擴大區域發展的視野

- 東協是亞洲最重要的自由貿易區，使得其與歐盟及北美自由貿易區鼎足而立。與其他二個重要的區域相比，東協的文化多元、複雜，歷史發展進程不一。
- 世界四大文化體系—印度、中國、伊斯蘭及西洋，均對個別國家有長遠的影響。如：印度文化中的宗教（尤其印度教、佛教）在西元前就已經傳到東南亞部分地區；中國文化自漢朝即開始與東南亞進行絲綢、陶瓷器、茶葉、漆器的貿易活動，唐朝以來各朝代均有移民前往東南亞；伊斯蘭則是西元十世紀以後開始發展，並深深地影響馬來西亞、印尼住民的思想及生活；此外，西方國家從十六世紀起，為了尋找香料而航向東方，引進了西洋文化並建立殖民地，菲律賓為東南亞最大的天主教國家。
- 四大文化體系影響了東南亞，經過多股勢力長期接觸、交織、融合，使得東南亞變得複雜多樣。部分國家雖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語言和種族，但也難免發生文化主權歸屬問題，而引起紛爭。如印尼和馬來西亞關係相當密切，雙方卻曾因傳統歌曲和傳統舞蹈的主權歸屬，屢有口舌之爭，也使得兩國關係陷入緊張。未來，如何建立東協內部的文化，連結區域民族，尚待時間的考驗。
- 東協之間除了要處理經濟及政治基本問題，強化社會及文化交融，還包括全球暖化、水資源分配、淹水或水庫等環境資源的建立，及氣候變遷所帶來之衝擊等，因此，在全球重要議題方面，彼此之間缺乏問題解決的有關連結，在區域長遠發展的議題，亦欠缺足夠的視野。

3.避免區域衝突，增進彼此了解，深化區域發展，將使東協的整合更有聯盟上的意義，也能與其他區域聯盟作區別

- 東協秘書長 Dr. Surin Pitsuwan 曾警示，東協的誕生亦同時創造輸家與贏家，東協是世界上最文化多元的區域之一，管理種族、宗教及認同差異與創造經濟機會，是同等重要的工作。東協內部的種族和宗教相當多元化，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多元化亦面臨新的挑戰，需要更多的技巧進行整合和合作，區域內的多樣性是一種力量，但也因而帶來了發展的弱點及威脅。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沒有安全感而擔心失去自己的身份。而具有信心及信任的人，則因為多元化而增強了繁榮的契機。成員間必須了解如何和諧相處，相互尊重，共創美好未來。
- 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中心，不是在中東、南亞和非洲，而是在東南亞，如：印尼 2.4 億人口的 88-89% 是信仰穆斯林；菲律賓則是東協唯一天主教佔多

數的國家；佛教不論是小乘佛教或大乘佛教的分支，也存在於東協的緬甸和泰國；而峇里島則是印度教占多數。

- 東協 10 國領導人 2007 年於新加坡完成「東協憲章」的簽署。「東協憲章」制定的目的，希望促進東協發展成為類似歐盟的組織，具備含法律約束力的法規與標準。反觀歐盟在有層次及階段下，成功整合歐洲，得以與美國抗衡，成功的因素除了成員支持外，也因具備了跨國機構及制度的安排，包括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歐盟部長理事會及歐洲理事會等，對歐洲整合具有開創與凝聚的作用，使之更能面對全球化對單一國家國力的挑戰；而政府間協定的制度設計則使得歐盟的整合更具彈性，凡事以維護各會員國的主權為前題，使整合之路得以持續往前邁進。東協如何創造自我價值，以與其他區域聯盟作區別，亦是未來東協須思考之方向。



2014 年 9 月 8 日「The Dimensions of Integration in ASEAN」分場座談照片

(八) 分場會議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Sustainability
時間	2014年9月8日，13時30分至15時
地點	Room “Kedah”,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Henrik Müller , Chair in Economic Policy Journalism, TU Dortmund University, Germany
與談成員	Richard Baldwin ,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Switzerland Pascal Lamy , Honorary President, Notre Europe-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France ; Former Director-Genera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Irene Natividad , President, Global Summit of Women, USA
會議紀錄	陳淑貞

討論題綱

1. I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 path towa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2. Does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stimulate or hamper technology upgrading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3. Are particular groups, for instance, skill-groups, differently affected by integration of global value chains?
4. Can national initiatives or private initiatives, such as seals of quality, solve sustainability concerns?

與談人發言重點

Henrik Müller

1. 過去由於亞洲具有大量廉價勞動力，全球供應鏈主要建立在東方生產，西方消費的模式上，一方面提升西方人消費購買力，另一方面也提升亞洲國家生產力與所得，形成雙贏局面。不過，好景不常，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歐美國家經濟衰退，消費力轉弱，亞洲則隨著經濟快速成長，勞動成本持續攀升，以往以亞洲為生產基地的全球供應鏈模式，刻正面臨挑戰，亟待轉型。
2. 參與全球供應鏈雖有助於共享全球化的利益，對已發開及開發中國家均有利。但對轉型中及開發中國家，能否在經濟增長同時，改善其勞工勞動生產條件、生產工廠體系等，兼顧永續發展，極為重要。

Richard Baldwin

1. 近年來新興經濟體拜出口快速成長所致，經濟快速發展，除部分國家(如：巴西、俄羅斯)出口成長主要來自原物料增長外，其他國家則來自製造產品增長。解析附加價值貿易，東亞國家的附加價值出口成長部分迥異，汶萊、越南、柬埔寨集中在天然資源出口，大多數則以出口製造品為主，只

有香港、新加坡、日本附加價值出口成長以服務出口為主。全球貿易以製造產品為主，北美生產基地(如墨西哥)、歐洲生產基地(如波蘭、土耳其)與亞洲相同，製造產品出口占主要比例高達2/3以上。

2. 在全球價值鏈的發展上，個人覺得有三個關鍵因素：

(1) **位置區位**：鄰近營運總部的國家(如：亞洲的日本、韓國、臺灣、大陸、新加坡、香港，北美的美國，歐洲的德國等)，因為鄰近供應鏈貿易者(包括營運總部與生產基地經濟體)，較容易加入全球價值鏈。雖然亞洲供應鏈希望在非洲、南美洲複製經驗，但基於區域及國家競爭力差異，尚待努力。

(2) **市場規模**：擁有上億人口的國家(如中國大陸、印度)可以追求人口較小國家無法做到的政策，因其可以將國內內需市場當作吸引供應鏈區塊的有利條件。比如：中國大陸可以透過內需市場的大餅，引進高科技廠商，雇用人才並移轉技術。相同政策，在馬來西亞則不適用。

(3) **確保有形及無形財產權**：為利生產鏈網絡中的廠商得以在各個生產過程中充分共同合作。能否確保有形及無形的財產權利，係為關鍵重要因素。如不能確保有形及無形財產權，各個廠商將捨不得曝露各自管理模式、技術與市場行銷訣竅，避免產生新競爭者。

3. 亞洲區域供應鏈中，已在其中的國家可以透過提升價值鏈方式，促進產業升級，此外，亦可透過區域經濟整合(如：ASEAN)，擴增在區域內供應鏈環節的參與度。以韓國為例，委外海外生產力增加，與國外供應商進行常規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會提升國內中小企業生產力；將勞力密集製造委外給垂直分工明確的ASEAN，有助於中小企業提高生產力，相對地，將高科技製造移至日本生產，則不利中小企業生產力。

4. 說到ICT技術對全球供應鏈的影響，可分為IT(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CT(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來看，前者屬技術密集製程就可以由機器人操作，後者需要面對面溝通，快速讓創意具體呈現化的製程，像是3D列印等，則無法由機器取代，隨著通訊技術進步，將會更快速的快速擴展。

Pascal Lamy

1. 在開發中國家中，東亞及東南亞以及中美洲是參與全球價值鏈(GVCs)程度最高的，全球價值鏈的參與亦促使較高的每人GDP增長。全球價值鏈促使許多中小企業得以透過加入GVCs，得到技術升級，促使生產流程、標準與品質與國際接軌，獲得全球化的利益。

2. 跨國企業(TNC)是主導全球價值鏈活動的決策者，參與GVCs雖可對附加價值、就業、所得、出口、技術及產業升級等帶來直接效益，但對低薪、危害健康、工廠安全、作業環境等亦可能造成負面影響，政策決策者可思考如何透過推動各項永續發展措施，吸引被納入全球價值鏈活動環節。

3. 聯合國全球企業永續報告(2013)指出，供應鏈的永續性仍是待克服的障礙。依聯合國所列人權、勞工、環境以及反貪污等評估原則，只有18%受調企

業有訂定相關目標並檢視，只有9%採取行動，改善問題。此外，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調查資料(2011)指出，低於1/3企業認為其供應鏈夥伴關係符合永續發展，只有12%企業願意提供誘因促使合作廠商，實行永續企業。企業表示推展永續理念，最大障礙在利潤導向的短期財務目標要求。

Irene Natividad

- 1.隨著網路科技進步，創業成本下降，越來越多女性及年輕人積極創業。ICT打破了GVC獨占產業的態勢，越來越多新創業者能快速運用網路科技，連結自己的全球供應網絡，快速找到客戶群，並供貨。GVC在規範制定過程中，不應只思考評估G7或G20的利益，應該去思考納入崛起的新創業者的利益，如降低進入門檻，方便中小企業及新創業者進入等。
- 2.最好的刺激經濟方式就是投資女性創業，因為女性創業家賺錢後，會改善家庭的健康與教育，並增加就業雇用。在美國，有44%公司為女性所擁有，並雇用至少800萬員工，GVC應思考如何改善，讓更多中小企業及新創業者參與，而不是只是增加GVC環節之工廠女性作業員工雇用而已。



2014年9月8日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Sustainability」
分場座談照片

(九)分場會議 (Sessions in parallel)

主題	The Future of Wages and Benefits 工資與福利的未來
時間	2014 年 9 月 8 日，13 時 30 分至 15 時
地點	Room “Penang”,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主席	Mike Orszag , Head of Research, Towers Watson, UK
與談人	Shamsuddin Bardan , Executive Director, Malaysian Employers’ Federation (MEF) Hans-Paul Bürkner , Chairman,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Germany Ted Fishman , Journalist, USA David Howell ,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Policy, The New School of Public Engagement, New York, USA
會議紀錄	賀麗娟

討論題綱

- 1.What could be the drivers of change in the future?
- 2.How do developments differ between industries?
- 3.What can we learn from a disaggregated perspective on the developments?
- 4.What policies do societies need to cope with these changes?

主題說明

工資與相關成本在未來如何發展，對於企業、政治與社會都是重要的問題。不均的演進，勞動所得應該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與工資和福利的發展有密切相關。人口、技術發展、或全球化等，對於工資與福利有明顯的影響。例如，短期間，技術可能破壞就業關係並降低對勞工的報酬，此情況已反映在勞動所得份額占比減少。再者，人口老化將增加工資相關的成本，例如年金保險制度。什麼事情可驅動未來的變動？各產業間有何不同發展？從不同的發展當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社會需要那些政策因應這些變化？

與談人發言重點

(一)Hans-Paul Bürkner

未來 10 年勞動市場的勞動力將持續增加，但是開發中國家的勞動力，大部分是從事非正式勞動市場的工作，例如地下經濟、黑市、未登記的自僱工作者、臨時工等，有些國家達 80%。非正規勞動市場的工作，其勞動條件通常較不好，因此，要使勞工的工資與福利合理化或具有競爭性，應強化正規勞動市場。

為強化正規勞動市場的相關法規，法規應使僱用與解僱較容易，開放勞動市

場。這樣的做法，可能降低目前正規勞動市場中少部分既得利益勞工的工資與福利，但中長期後，對於一般勞工來說，將使勞動條件更好。

工資與福利的未來，主要取決於提升勞動力的能力，增加勞動生產力，投資教育與訓練，提升勞動力能力，是吸引企業投資，創造工作與所得最好的途徑。

(二) Shamsuddin Bardan

1、要提升工資與福利，增加勞動生產力是非常重要的，以新加坡與印尼為例，新加坡的工資是印尼的 10 倍以上，但是新加坡的勞動生產力很高，可解決工資較高的成本問題。

2、馬來西亞提高生產力的做法有 5 項：

(1)企業組織發展：使開創事業更容易，簡化商業流程。

(2)人力資本管理

①擁有具競爭力與高技術的勞工，方可促使全要素生產力成長快速。由於時代變遷快速，人力資本發展計畫，強調訓練出來的技術勞工，應具備產業所需之關鍵與應用技能，也符合經濟相關之終身學習。馬來西亞的無技術勞工占 70%，南韓只有 39%。

②檢驗企業的僱用方式、獎勵制度，以反映員工的貢獻。

③彈性化勞動市場，並促使勞資雙方的了解，有助於提升長期的全要素生產力。

(3)創新能力：提升企業創新能力，有助於企業經營與國際競爭力。

(4)技術的取得與運用：投資新技術，增加知識型的勞工。

(5)有效率的管理：透過有效率的管理與提升勞動力品質，可吸引投資。

3、確保勞工的工資調整與生產力增加有密切相關，使勞工從生產力、績效提升中得到公平的分配，如此可促進競爭力。

(三) Ted Fishman

中國大陸雖然面臨人口老化問題，但勞動力短缺問題並不嚴重，因為一胎化政策，使每個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投資非常高，竭盡所能供子女上大學，目前中國大陸每年大學在學生，近 3 千萬人，比印度、美國的合計還多，相當驚人。如此培養出來的年輕勞動力，較過去低工資勞工的生產力多出好幾倍。

過去一胎化的孩子，有祖父母協助父母照顧，但是近年開始，一般家庭的祖父母也要工作，須要透過某些方式協助照顧子女，或為子女提供社會服務，因而推高了勞工的工資。

(四) David Howell

依 2009 年的統計數據，比較 20 個富有國家，美國領取低工資的勞工占比約 25%，只低於韓國的 25.7%，高於其他歐洲國家，德國、加拿大、英國約 20%，法國 11%，挪威 8%、比利時 4%，顯示美國低工資問題嚴重。

為解決低工資問題，可從 2 方面處理：

- 1、生產力：透過科技與教育，提升勞動品質，增加勞動生產力。
- 2、最低工資：但是許多基層工作無關技術，美國工廠勞工有 44% 領取低工資，針對這些低工資勞工，他們需要的是保障。跨國比較是很危險的，歐盟國家的跨國比較，是為了保障受到最不好待遇的勞工。在最低工資議題上，許多人認為法國的高最低工資引起高失業率，法國 2000 年最低工資與失業率分別為 6.41 歐元、10.3%，2007 年為 8.44 歐元、8.0%，2010 年為 8.86 歐元、9.3%，相對於美國，2000 年為 5.15 美元、4.0%，2007 年為 5.85 美元、4.7%，2010 年為 7.25 美元、9.8%，但從以上數據顯示，並不能證明高最低工資引起高失業率。

(五)Duncan Campbell

歐洲有許多國家的經濟面臨 0% 成長，於是思考勞動市場鬆綁法規，但無助於其經濟，因為影響經濟的因素有太多面向。



2014 年 9 月 8 日「The Future of Wages and Benefits」分場座談照片

六、閉幕

主題	Officiation Ceremony & Concluding Plenary
時間	2014 年 9 月 8 日，17 時至 18 時 45 分
地點	Room “Plenary Hall”, The Shangri -La Hotel Kuala Lumpur
與談主席 (Moderator)	Declan Curry , Business Journalist and Conference Speaker, UK
與談成員 (Panelists)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Sahol Hamid Abu Bakar, President and Vice Chancellor,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Malaysia• Pascal Lamy, Honorary President, Notre Europe - Jacques Delors Institute, France; Former Director-General,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Switzerland• Dennis J. Snower, President,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President, 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rmany
特別演講 (Speaker)	Muhyiddin bin Mohd Yassin ,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Minister of Education, Malaysia
會議紀錄*	黃晏青

會議內容

「GES 2014」匯聚全球產、官、學界菁英人士，為論壇帶來充足的知識能量，透過各個座談提出解決方案(solution proposal)，未來期望可以進一步將提案規劃為具體執行專案(projects)。

誠如 Snower 院長所言，經濟與社會的互動，如同大樹與樹根的相互依賴，全球目前面對諸多基本問題，無法經由市場機制解決，經由此次論壇，彙整提出多項值得參考的解決方案，摘提部分如下：

1. 與會專家咸認年輕人與女性擁有極大值得開發的潛力，就青年族群而言，應提供年輕人獲得更好、更高教育的機會，也應在大學課程裡，置入教導學生何謂創業精神的課程。
2. 亞洲國家或是東協國家應積極建置交換學生專案，透過「人才迴圈、腦力循環」(brain circulation)的正向循環能量，有助於提升亞洲或東協國家的學生競爭力
3. 相對於其他電力來源而言，建置家用太陽能電力系統以解決貧窮人口的用電與電價問題，是較為永續的解決方案。
4. 城市規劃需要全面性的基礎建設建置，不僅只是高速公路、建築物的建設等硬體方面的考量，更應從生活面、教育面全方位思考，研擬有助於生產、生活、生態的城市規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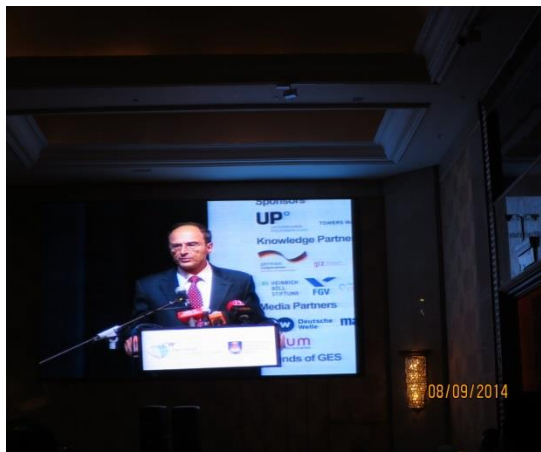
*:本場會議紀錄主要內容由工研院黃筱雯副研究員撰擬



Kiel 研究院院長 Dennis Snower 向貴賓致意



瑪拉工藝大學副校長 Sahol Hamid Abu Bakar 致詞



Kiel 研究院院長 Dennis Snower 致詞



WTO 前執行長 Pascal Lamy 致詞



馬國副總理 Muhyiddin bin Mohd Yassin 致詞



管主委於閉幕典禮時應邀就座於貴賓席



管主委與 WTO 前執行長 Pascal Lamy 交談



管主委與 WTO 前執行長 Pascal Lamy 交談



管主委與 WTO 前執行長 Pascal Lamy 交談



管主委與 WTO 前執行長 Pascal Lamy 交談



管主委與丁廣欽董事長合照



管主委與韓國產業經貿研究所所長 Do-Hoon Kim 合照

參、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GES 2014」大會議題

1. 本次大會主題為「經濟重建 社會轉型」(Restructuring Economies, Transforming Societies)，議題主軸為邁向永續經濟(Towards Sustainable Economies)、邁向公平社會(Towards Equitable Societies)、邁向適當治理(Towards Adequate Governance)等三大領域，研討會議聚焦提出解決對策，透過會議瞭解到經濟發展就像一棵大樹，需奠基在公平社會的沃土上，方能永續成長，而公平社會的達成(包括失業、所得不均等問題)，則需透過適當的治理，包括政府治理與公司治理(如：道德的培養)。
2. 全球目前面對諸多基本問題，無法經由市場機制解決，經由此次論壇，彙整提出多項值得參考的解決方案，諸如提供年輕人如何創業的課程、建置交換學生專案、建置太陽能電力系統、全方位的城市規劃等。其中，多項論點，已於今年5月在台舉辦的「2014 GES 台北研討會」(GES Taipei Workshop)提出，並納入本次GES大會由我國主辦之「培養創新能力以因應全球供應鏈調整」(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分場議題；會場中與會者踴躍發言，除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外，更具體展現台灣身為國際一分子，具有解決國際性議題的行動力與貢獻。

(二)分場議題及一對一晤談

1. GES所討論範疇均為全球經濟發展重要議題，參與會議期間諸多收穫，其中分場座談「Shaping a Free and Fair World Trade Order」，推翻以往對區域整合「區內受益、區外受害」的舊思維，認為21世紀區域經濟整合已跳脫以往關稅壁壘的範疇，係就法規、制度及產業鏈方面進行整合，除有利於區內盟友外，透過外溢效果的擴散，亦可嘉惠、帶動其他國家發展及加速自由化進程。
2. Dr. Stiglitz及Baldwin二位教授對於台灣積極加入TPP或RCEP區域經貿整合，以及與大陸簽署ECFA至表贊同，中國大陸已是全球供應鏈的重要基地，將中國大陸排除在外或不與其合作是不可能的，惟須研擬相關配套措施。因應區域整合發展及中國大陸市場競爭，應善用台灣利基，發展華文相關服務業，並促進製造業服務化發展，以及投入高齡化有關商機。
3. 本次會議深深體驗中國大陸的經濟影響力，投資亞洲分場議題，大家絡繹不絕地講中國大陸的發展與投資機會，馬來西亞當地參與者不禁提醒大家，亞洲投資機會除了中國大陸，還有很多其他國家，包括韓國、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等，希望歐美參與者也能看見除中國大陸之外的亞洲其他國家。

(三) 瑪拉工藝大學辦理GES之行政安排

1. 本次為GES首次在亞洲舉辦之會議，透過本次會議，感受到馬來西亞推動會展產業經驗，值得我國學習。馬來西亞辦理會議，結合了官、產、學界多方有形與無形資源，包括：瑪拉工藝大學、財經部會首長、當地大型企業及金融機構贊助等，除會議外，包括聯絡、交通、住宿、餐飲、活動等均能妥善安排銜接。晚宴活動更透過多元民族表演，行銷其文化觀光，讓參與外賓了解其文化特色，除知性面增長知識外，更具文化感性之美。
2. 各分場會議，皆可見瑪拉工藝大學的老師們熱烈參與、積極發言或個別私下交換意見，與談人也發表相當多的馬來西亞或亞洲鄰近國家經驗，顯示馬來西亞產、官、學界參與國際會議的積極態度，非常值得我國學習。
3. 現場設置及時回饋的電子信箱Ges14ideas@gmail.com，會中可隨時傳送個人觀點或意見，主持人會立即回應；各分場座談會議室標示清晰，且空間大，足以容納有意進入的所有與會人員；場外餐點供應充分，不用等候排隊，再再展現主辦單位在提供軟硬體方面的貼心與用心。

二、建議

(一) 對GES大會之建議

1. **資訊共享**：GES會議所提供資訊及設備均相當完善，每場次多半都有錄影，建議GES應將會議錄影於會後提供與會人員或置於網站供各界參考，有利知識擴散。
2. **應確實掌控會議時間**：部分分場會議調整出席人員，若能於會場明確標示，應有助於與會人員參考；由於同時段有多場會議，會議時間的掌控發生進度不一致情形，而影響下一場會議的參與，未來似可改進。

(二) **發展「結合服務業與製造業」，開創產業發展新契機**：面對全球產業鏈結構轉型，我國產業政策應奠基在既有的製造業優勢上，發展結合服務業的輸出服務，透過整廠整案輸出模式，開創下一波產業發展的新契機。目前臺灣整廠整案輸出能量多集中在公共事業、發電廠或石化廠等領域，未來亦可將臺灣過去成功的園區及對外援助經驗，列為未來整廠整案輸出的思考方向。

(三) **各國皆重視工資不均、低工資問題**：與人力相關的分場會議中，與談人多論及工資或所得不均、低工資等問題，開發中國家，如馬來西亞分享的解決之道，主要以促進經濟發展為根本，提升人力資本以促進勞動生產力也是重要工作，已開發國家，則開始注重勞動保障問題，認為以提升土地課稅，彌補對勞動的減稅；甚至不止一位學者提出，除提升勞動生產力，以增加工資外，調升最低工資，也是因應低工資問題的解決對策。我國亦面臨工資停滯問題，各國分享之經驗或想法，應可做為未來研議分析相關政策之參考。

- (四) **加強統計資料之建立，成為研議政策重要之基礎建設：**無論是不同主題的分場會議，或與ILO的Campbell先生會談，與會學者專家多有提到，政府在研議分析政策時，完善的統計資料是必要的。由於經濟社會發展變遷快速，我國亦面臨，當政府研議分析相關問題時，常常缺乏有關之統計資料，顯現統計追不上問題之現象，例如領取基本工資的勞工人數，因照顧老人、失能家人而無法就業之非勞動力人數等。統計資料是研議政策的基礎建設，我國在此方面的資源分配應予加強。
- (五) **我申辦目標年宜訂於2018年或之後：**GES自2008年首屆會議起，循例由德國與其他國家輪流主辦，2010、2012年的主辦國分別為土耳其、巴西，2014年係GES第一次在亞洲主辦。Snower院長在9月8日與主委會談中曾提及，2016年的主辦地點可能選在尚未舉辦過GES的非洲。考量2014年甫於馬來西亞召開，因此研判我國爭取主辦2016年GES之成功機會頗低，建議我國如欲申辦，目標年宜訂於2018年或之後。
- (六) **繼續強化我與GES的互動：**GES為大型國際會議，歷年與會人數多在600人左右，議題包括經濟、社會及環境面，以2014年為例，會方共邀請來自全球歐、美、亞、非各大洲的175位講者，除會議主題外，共進行44分場議題的討論，須有縝密之行政規劃。此次馬國主辦單位亞瑪拉工藝大學人員表示，能取得2014年主辦權，係因該校與Kiel經濟研究院有多年良好合作關係。因此，如欲爭取GES顧問團(advisory board)對我申辦GES之支持，現階段宜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強化我與GES的互動，藉由積極參與或主辦GES相關活動，以及交換學者等方式增進雙方關係，蓄積籌辦GES能量，並提升我參與國際事務的能見度。

肆、附錄

一、團員名單

姓名	單位	職稱	備註	
管中閔	國家發展委員會	主任委員	其他分場議題 與談人	1
蔡瑞娟	國家發展委員會 綜合規劃處	專門委員		2
黃晏青	國家發展委員會 綜合規劃處	專門委員		3
賀麗娟	國家發展委員會 人力發展處	專門委員		4
陳淑貞	國家發展委員會 產業發展處	專門委員		5
邱莉婷	國家發展委員會 經濟發展處	科長		6
陳宏守	果實夥伴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人暨董 事長	台灣分場議題 與談人	7
丁廣欽	鋁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其他分場議題 與談人&演講者	8
毛德蕊 Debra Mao	彭博新聞 Bloomberg News	台北分社社 長	其他分場議題 主持人	9
王泓仁	臺灣大學經濟系	特聘教授		10
杜紫宸	工業技術研究院 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	主任	台灣分場議題 主持人	11
楊致行	工業技術研究院 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	資深督導	其他分場議題 與談人	12
洪立瑜	工業技術研究院 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	正研究員		13
黃筱雯	工業技術研究院 知識經濟與競爭力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14
鄭杰	經濟日報	記者		15
劉靜瑤	工商時報	記者		16
王怡方	資訊工業策進會 產業情報研究所	產業分析師		17

二、行程表

日期	9月5日(五)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09:40-14:15	台灣團員(第一批)離開台灣、飛抵馬來西亞 工研院：楊致行、黃筱雯	台灣桃園 →馬來西亞吉隆坡	
9/4, 19:00 -9/5, 15:35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院 劉宛鑫博士離開德國、飛抵馬來西亞	德國→馬來西亞吉隆坡	
住宿：香格里拉大酒店			

日期	9月6日(六)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08:40-12:25	毛德蕊 Debra Mao 離開香港、飛抵馬來西亞	香港→馬來西亞吉隆坡	
09:40-14:15	台灣團員(第二批)離開台灣、飛抵馬來西亞 國發會：管中閔、蔡瑞娟、黃晏青、賀麗娟、陳淑貞、邱莉婷 工研院：杜紫宸、洪立瑜 丁廣欽、陳宏守、王泓仁、劉靜瑀、鄭杰	台灣桃園 →馬來西亞吉隆坡	7:40 團員於長榮櫃台會合
10:15-11:10	王怡方離開新加坡、飛抵馬來西亞	新加坡→馬來西亞吉隆坡	
15:30-	楊致行資深督導、劉宛鑫博士、黃筱雯於香格里拉大酒店待命，協助管主委及團員之 GES 報到與房間 check-in	香格里拉大酒店	
17:00-17:15	GES 2014 開幕致詞 Welcome Remarks	香格里拉大酒店	
17:30-19:00	毛德蕊小姐擔任其他分場議題主持人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香格里拉大酒店	
20:00-22:00	管中閔主委擔任其他分場議題與談人 “The Future of Jobs”	香格里拉大酒店	
住宿：香格里拉大酒店			

日期	9月7日(日)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全日參加GES、與國際重要人士晤談			
7:30-breakfast	杜紫宸主任、王泓仁教授會晤 Robert Johnson President,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USA	香格里拉大酒店 Hotel restaurant	
08:45-10:15	開幕式 Opening Plenary	香格里拉大酒店	
10:30-11:0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Joseph Stiglitz Nobel Laure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IPA),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香格里拉大酒店 Room “Mezzanine2”	10:25 請至GES Registration Desk (報到註 冊處) (樓層 Lower Lobby)等 候，GES會派 人引導到會 議室。
10:30-11:45	毛德蕊小姐擔任其他分場議題 主持人 “Investing in Asia - Cyclical or Structural Growth Slowdown?”	香格里拉大酒店	
12:00-12:3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 Richard Baldwin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Switzerland	香格里拉大酒店 Room “Mezzanine 2”	11:55 請至GES Registration Desk (報到註 冊處) (樓層 Lower Lobby)等 候，GES會派 人引導到會 議室。
13:30-14:00	丁廣欽董事長擔任演講者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d Cities: Example of Phu My Hung New City Center in Ho Chi Minh	香格里拉大酒店 Room “Penang” (Floor “Lower Lobby”)	此場演講採 邀請式

日期	9月7日(日)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City, Vietnam”		
14:30-15:0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 Jonathan Woetzel Director, McKinsey & Co, China	香格里拉大酒店 Room “Mezzanine 2”	14:25 請至GES Registration Desk (報到註 冊處)(樓層 Lower Lobby)等 候，GES會派 人引導到會 議室。
16:00-16:3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 Duncan Campbell Director for Policy Planning in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witzerland	香格里拉大酒店 Room “Mezzanine 2”	15:55 請至GES Registration Desk (報到註 冊處)(樓層 Lower Lobby)等 候，GES會派 人引導到會 議室。
20:00-22:00	台灣主辦分場議題之會前討論 Preparatory Meeting of Taiwan Session (4+1)杜紫宸主任、陳宏守董事 長、穆榮平所長、青木玲子教 授、金道薰院長	香格里拉大酒店 一樓餐廳：香宮 (Shang Palace) 訂位號碼SP00321	座位保留至 20:15 出示訂位確 認函，消費金 額可打九折。
住宿：香格里拉大酒店			

日期	9月8日(一)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全日參加GES、與國際重要人士晤談			
9:20-9:5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Dennis Snower President,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Director, 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S), Germany	香格里拉大酒店	討論議題：the next workshop in Taipei and other cooperation 註：9:10 請至GES Registration Desk (報到註冊處)(樓層 Lower Lobby) 與劉宛鑫博士會合，GES會派人引導到會議室。
10:15-11:45	楊致行資深督導擔任其他分場議題與談人 “Adventures in waste and recycling policies- creating value”	香格里拉大酒店	
15:00-15:30	行程待定		
15:15-16:45	丁廣欽董事長擔任其他分場議題與談人 “Smart urban planning for megacities”	香格里拉大酒店	
15:15-16:45	台灣團隊主辦分場議題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香格里拉大酒店	
17:00-19:00	閉幕式 Officiation Ceremony & Concluding Plenary	香格里拉大酒店	
17:40-21:35	王怡方離開馬來西亞、前往香港	馬來西亞吉隆坡→香港	
19:30-	羅由中大使晚宴	香格里拉大酒店	

日期	9月8日(一)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一樓餐廳：香宮 (Shang Palace)	
住宿：香格里拉大酒店			

日期	9月9日(二)		
時間	行程	地點	備註
8:30	3位團員先行前往機場辦理行李check-in 楊致行、洪立瑜、黃筱雯		
9:00-9:3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Baudouin Regout Head of the Analysis Team, BEPA (Bureau of European Policy Advisers), European Commission, Belgium	香格里拉大酒店 Hotel restaurant	8:55 請至GES Registration Desk (報到註冊處) (樓層 Lower Lobby) 等候，GES會派人引導到會議室。
09:30-11:30	馬來西亞吉隆坡市區參訪		
12:00-13:00	台灣團答宴		風味餐-肉骨茶
12:40-13:40	劉宛鑫博士離開馬來西亞、前往新加坡	馬來西亞吉隆坡→新加坡	
13:30-17:25	毛德蕊Debra Mao離開馬來西亞、前往香港	馬來西亞吉隆坡→香港	
15:20-20:10	台灣團員離開馬來西亞、返抵台灣 國發會：管中閔、蔡瑞娟、黃晏青、賀麗娟、陳淑貞、邱莉婷 工研院：杜紫宸、楊致行、洪立瑜、黃筱雯 丁廣欽、陳宏守、王泓仁、劉靜瑀、鄭杰	馬來西亞吉隆坡→台灣桃園	

三、GES 2014 議程

Saturday 6 September						
Time/Room	Plenary Hall	Kedah	Selangor I	Perak	Johore	Penang
09:00-17:00	Registration					
17:00-17:15	Welcome Remarks					
17:15-17:30	Break					
17:30-19:00		Setting the Scene -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Setting the Scene - The Global Geopolitical Outlook			
19:00-20:00	Break					
20:00-22:00		The Future of Jobs	The Future of Global Money	Teaching Nothing but Thinking	The 21st Century Challenge: Inclusive Leadership	

Sunday 7 September						
Time/Room	Plenary Hall	Kedah	Selangor I	Perak	Johore	Penang
08:30-08:45	Opening Speech					
08:45-10:15	Opening Plenary					
10:15-10:30	Networking Break					
10:30-11:45	Our Energy Future	Investing in Asia - Cyclical or Structural Growth Slowdown?	A Pivot to the East? Geopolitics in Asia			
11:45-12:00	Networking Break					
12:00-13:15		Enhancing Social Capital	Monetary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Creating Virtuous Talent Triangles for Labor Migrants: An Asian Perspective	The Future of Social Impact Investing	Bringing Electricity to the Poor
13:15-14:15	Networking Lunch					
14:15-15:45		The Potential of Macroeconomic Surveillance	Fighting Corrup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Social Cohesion - Measuring Common Ground	Nor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How Best Can US and Russia Address the Sources of Global, National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and Promote Security?	Addressing Financial Uncertainty

Sunday 7 September						
Time/Room	Plenary Hall	Kedah	Selangor I	Perak	Johore	Penang
15:45-16:00	Networking Break					
16:00-17:30		How to Bring Morality into Markets?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Today's World	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Nor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How Best Can Chi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Address the Sources of Global, National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and Promote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17:30-18:00	Networking Break					
18:00-19:30		Forests, Food and Biodiversity	Addressing Inequality	Shaping a Free and Fair World Trade Order	Nor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How Best Can Brazil, India and EU Address the Sources of Global, National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and Promote Security?	Climate and Competitiveness
20:30-22:30	Gala Dinner hosted by the Minister of Tourism of Malaysia					

Monday 8 September						
Time/Room	Plenary Hall	Kedah	Selangor I	Perak	Johore	Penang
08:30-10:00	In parallel- Islamic Finance & Dealing with Rising Inequality					
10:00-10:15	Networking Break					
10:15-11:45		Escaping the Middle Income Trap	Losing Ground	Consensus-Building in Transformation Processes	Norms for Global Governance How Best Can Countries Address the Sources of Global, National and Human Vulnerability, and Promote Security?	Adventures in Waste and Recycling
12:00-13:30	Networking Lunch					
13:30-15:00	The New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Sustainability	The Dimension of Integration in ASEAN	Successful Policy Design for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Good Governance - For Peoples Sake	The Future of Wages and Benefits
15:00-15:15	Networking Break					

Monday 8 September						
Time/Room	Plenary Hall	Kedah	Selangor I	Perak	Johore	Penang
15:15-16:45		Smart Urban Planning for Megacities	A New Dawn for the Future of the Ocean?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Health Systems Reform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16:45-17:00	Networking Break					
17:00-18:45	Officiation Ceremony & Concluding Plenary					

四、GES 2014 各會議場次主政人員與出席/陪同人員

*:主政人員負責提供談參資料及撰擬會議紀錄(含錄音與照相)或紀要

日期	時間	會議	主政人員*	出席/陪同人員
9/6	17:30-19:00	毛德蕊小姐主持場次 “Th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X	X
	20:00-22:00	管中閔主委與談場次 “The Future of Jobs”	X	X
9/7	7:30- breakfast	杜紫宸主任、王泓仁教授會晤Robert Johnson President, The 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 USA	杜紫宸	杜紫宸、王泓仁
	08:45-10:15	Opening Plenary 開幕式	楊致行、黃筱雯	全體團員
	10:30-11:0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Joseph Stiglitz(經濟處主政) Nobel Laureate;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IPA), Columbia University, USA	邱莉婷、杜紫宸	黃晏青、邱莉婷 杜紫宸、王泓仁
	10:30-11:45	毛德蕊小姐主持場次 “Investing in Asia - Cyclical or Structural Growth Slowdown?”	X	X
	12:00-12:3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Richard Baldwin(經濟處主政)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 Graduate Institute Geneva, Switzerland	邱莉婷、洪立瑜	蔡瑞娟、邱莉婷 洪立瑜
	13:30-14:00	丁廣欽董事長演講場次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Based Cities: Example of Phu My Hung New City Center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X	X
	14:30-15:0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Jonathan Woetzel(產業處主政) Director, McKinsey & Co, China	陳淑貞、洪立瑜	黃晏青、陳淑貞 洪立瑜

日期	時間	會議	主政人員*	出席/陪同人員
	16:00-16:3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Duncan Campbell(人力處主政) Director for Policy Planning in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Switzerland	賀麗娟、洪立瑜	蔡瑞娟、賀麗娟 洪立瑜
9/8	09:20-09:5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Dennis Snower(綜規處主政) President,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Director, Global Economic Symposium (GES), Germany	黃晏青、杜紫宸	蔡瑞娟、黃晏青 杜紫宸
	10:15-11:45	楊致行資深督導與談場次 “Adventures in waste and recycling policies- creating value”	楊致行、黃筱雯	楊致行、黃筱雯
	15:15-16:45	丁廣欽董事長與談場次 “Smart urban planning for megacities”	楊致行	楊致行
	15:15-16:45	台灣團隊主辦之分場議題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陳淑貞、賀麗娟 黃筱雯	陳淑貞、賀麗娟 洪立瑜、黃筱雯
	17:00-19:00	Officiation Ceremony & Concluding Plenary 閉幕式	洪立瑜、黃筱雯	全體團員
9/9	9:00-9:30	管中閔主委一對一晤談Baudouin Regout(產業處主政) Head of the Analysis Team, BEPA (Bureau of European Policy Advisers), European Commission, Belgium	陳淑貞、杜紫宸	賀麗娟、陳淑貞 杜紫宸

五、台灣主辦分場座談簡介

Topic: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The Challenge

Having become more intensive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has brought many new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o particularly East Asian firms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 latest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uccessive European debt crisis have, however, forced many of them to rethink their business strategy of how to reposition themselves i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s to better consider the rapidly changing global economic situations and to actively deal with global challenges. One key element here is innovation. Firms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need to raise the knowledge intensity of their business operations; those from service industries need to intensify their knowledge base of services provided and firms from the high-tech industries need to increase the extent and depth of their innovation activities. All these are expected to increase firms' innovation intensity, enabling them to move upwards along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o take over higher value added tasks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How can firms better adjust their existing business strategy towards innovation and thus enhance their core capabilities to deal with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What kinds of roles could governments play to foster innovation? Should governments focus more on improving domestic business environment? How could governments support firms in identifying innovation impediments and in exploring appropriate solutions?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how can Asian economies make use of the particularly intensive linkages in supply chains among firms in Asia to build a regional environment friendly for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in innovation? How could Asian economies adjust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s, such as laws and regulations, market mechanism and education systems, to support innovation-based growth?

Solution Proposal 1

Enhancing cooperation for innovation among companies specialized in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DoHoon Kim, Ph.D.

President,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South Korea

Competition for seizing more market share than others looks ever increasing among companies producing final consumption goods. In this line, they do not hesitate to bring others to the court, even if they are in a cooperative position in terms of exchange of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However, we may pursue global cooperation for innovation among companies producing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as they are not faced with direct competition each other.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out a huge trade flow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s from Asia to America and Europe. In fact, Japan, Korea, Taiwan and China are leading export countries of manufacturing products in the world. Related to this, there has been a kind of harsh competition among manufacturing firms in these countries. So, we can see very often news about their rivalry in the global market and we can encounter many analytical studies which show us their rise and fall. However, if we see only this aspect of competition above the sea level, we should not miss another important aspect under the sea level, cooperation. Actually, these countries and firms tend to help each other to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of others' manufacturing products, by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machines,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So, manufacturing firms in Asia practice harsh competition and undeniable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Unfortunately, this cooperative attitude cannot be easily found for the purpose of R&D activities yet in Asia. In order to foster cooperation for innovation, we should be focused on this aspect of cooperation.

Problem faced

Usually companies specialized in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CSCM) ar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xcept several notable exceptions. Therefore they are not usually available in global cooperation. In fact, they are rather too much dependent on companies specialized in final consumption goods (CFCG). In this sense, governments can do some efforts for enhancing cooperation for innovation among CSCM.

Suggestions

- **Promot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bout CSCM.** As CSCM are rather small and dependent on CFCG, they are not very eager to search other global clients. Governments may collect information, make catalogs about CSCM and disseminate this information among potential global clients.
- **Promote standardization and mutual recognition of major technologies across-the-border level.** In order for CFCG to outsource more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ly, it would be better that products of CSCM are more standardized and their technologies are more recognized across-the-border level.
- **Facilitate across-the-border level alliances among CSCM.** Countries do not tend to be friendly for across-the-border alliances of CFCG by the concern of monopolization and/or technology leakage etc. However, alliances amo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may avoid these concerns.
- **Provide opportunities of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R&D for CSCM and/or CSCM with universities and think tanks.**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is not very effective even in the national level. Governments may provide some collective R&D programs to CSCM, preferably open to CSCM of other countries. Governments may organize many technology sharing shows for them.

Conclusion

It will not be easy to organize this kind of cooperation among CSCM at the really global level. However, as we can see very intensive de facto cooperation at the commercial level in Asia in this area, we may try various forms of cooperation in Asia and globalize them in the future if successful.

Solution Proposal 2

Fostering Innovation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djustment

Reiko Aoki, Ph.D.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Innovation is the solution in two levels. Innovation is required for new products and new production methods.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s is also required to promote innovation. Innovation of institutions also may be non-linear and disruptive.

Global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system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trade assume labor is the least mobile. This is no longer the case. Labor will move across borders responding to demand. While in the short run a country with a shortage of certain skills and knowledge may resort to immigration, or even in some cases accessing skills abroad using ITC which will not require works to physically move. But this strategy is not sustainable in the long run. The world or a region as a whole must invest in human capital and knowledge and all members will benefit. Immediate solution is to promote exchange of workers and students. This will also achieve diversity of ideas and knowledge, In addition this will promote communication which leads to more efficient supply chains. Perhaps we could also go up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ocess and coordinate or harmonize parts of education system, such as what should be taught as basic math or science. Such approach will also allow pedagogical innovation to be shared widely. Obviously, complete harmonization should be avoided because it leads to lack of diversity. In fact, there could be coordination regarding what par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is specialized by country and which part is harmonized.

Supply chai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 new product and many parts typically include knowledge and breakthroughs made in multiple countr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contract law are some of the institutions necessary for someone other than the innovator to benefit from technology. Learning about new technology is related to circulation of peopl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requires different set of rules and it is just as important.

Global competition policy

Competition and innovation are complementary. Competitive markets make innovation necessary and successful innovation very profitable. Competition among sellers is good buyers. Final good producers benefit when suppliers are competitive. Consumers benefit from competitive product market. Needless to say when all

suppliers, buyers,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re within a country, a country is able to implement competition policy to benefit the whole system. However, wh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resid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 country's competition policy to benefit its residents (firms, consumers) may be not be best for stakeholders in other countries. To overcome this problem, there must be some form of coordination in competition policy. Currently there is no venue to consider global competition policy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economy, i.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addition to short term benefit from efficient pricing, there must be optimal competition policy for the world to benefit from innovation in the long term. It is essential for competition policy to be part of the whole economy. One possibility is to include competition policy in trade negotiations,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was included. TRIPS has lead to harmonization of IP, assisting firms to innovation around the globe.

Solution Proposal 3

Let's embrace “Demand-Chain driven”, “Service-centric” new economy ...

Everyone is active participant in connected Value Chain

Hilo Chen

Founder & Chairman, GuoShi Partners Corp., Taiwan

Proposal Rationale

Firms sit on Global Supply Chain need to know their customers' customer

The latest 2008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uccessive European debt crisis have put firms in traditional production industry to rethink their business going forward and their positioning. This is not just a wake up call but an urge to explore new business area to sustain the firm's survival.

In addition to seeking collective innovation within Global Supply Chain where they're currently belong to, they are eager to look beyond their comfort zone. They know there's even bigger threat if they stay distance from end-market. There's strong calling to raise the visibility on end-market to keep them alive and grow them better.

While firms need the first hand end-market feedback, this exploration experiment provides firms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and learns how to add value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Getting to know customer's customer is a logical and natural extension for those firms sit o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to conduct growth management with higher success rate. With that, firms will strategize to re-assess their Business Model, Core Competence and to grow either organically or via M & A.

In short, firms sit on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need to get a good sense and feel about end-Market and to grasp the trend, the preference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Market Needs.

Internet has changed everything

In this rapid changing economic situations, business leaders from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re all bearing “ Internet Anxiety “. These executives are all impacted by the ridiculously high valuation the internet companies enjoyed with such a short company history and are all concerned if they don't do something to relate their business with Internet, their business might be eaten up by some Start-ups coming from nowhere.

By nature, Internet is a platform that serves people everywhere (There's no geographical barrier. It's Global Local or Glocal), serves people all the time (There's no time zone limitation, no work time or off time distinction. People can work around it simultaneously or complementary in different time zone) and serves everyone on

the Supply Chain or Demand Chain that are connected simultaneously.

Internet enables firms sits on global supply chain the possibility to operate demand- chain at the same time.

Opportunity emerged for SMB, Start-up and Large Enterprise to work together

Large Enterprise sits on the upper stream of Global Supply Chain might transform to act as " Specific-service " platform provider/integrator that is to glue Supply-side and Demand-side players leveraging Internet to develop product/service at Supply-side so to satisfy the needs from Demand-side.

To create an even bigger opportunity with bigger value proposition, Large Enterprises are expected to act as a supply side and demand side ecosystem builder.

On the “ Specific- service “ platform that Large Enterprises build, there're good opportunity for SMB and Start ups to emerge/grow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 ecosystem.

Modularized services to be dynamically configured to serve new/emerging Market Needs

In the supply or demand side ecosystem, SMB and Start Ups are encouraged to build innovative services which is partial offering to be integrated by Large Enterprise to address specific Market Needs.

SMB and Start Ups are sensitive to and capable of developing Solution to specific needs or to specific problems within fast turnaround.

It's an Innovation process for Large Enterprise to integrate SMB/Start Ups' offering into One solution set that presents a complete Value Proposition to market need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Large Enterprise

This is also a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Large Enterprise to adjust themselves in Global Supply Chain toward a “ Specific-service “ pivotal integrator/platform provider in the Connected Value Chain (Demand-Chain driven, Service-centric and ecosystem builder to bring SMB/Start Ups on board)

There's new core competence required while Large Enterprise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Be it to grow organically or to invest to grow or to acquire via Merger & Acquisition.

With the core competence in place, business model is solidified and followed by operational excellence to transform the Large Enterprise and to vitalize the ecosystem consisted of SMB and Start Ups innovatively and successfully.

Government role

To be of value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Government is expected to create “ Domestic market needs “ together with Large Enterprise via BOT projects or other innovative incentive measures and to stimulate SMB/Start-ups emergence encompass ecosystem built by Large Enterprises.

Government is also expected to help with “ Solution sourcing “ that attract SMB and Start-ups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ecosystem ultimately create an even bigger value proposition meeting Market Needs.

While there’s domestic success, Government is also expected to help with “ Cross Country collaboration “ either source to join the ecosystem to build Solution or to introduce the solution to foreign countries that to expand the market.

專家簡介

陳宏守(Hilo Chen)

果實夥伴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董事長

Founder & Chairman,

GuoShi Partners Corp. (GSP Corp.)



Mr. Chen now also serves as Independent Director to following Public Companies ranging from Component Manufacturing , Semicon testing equipment ,Bio Tech to Internet eCommerce industry : Yageo Corp. (TW-2327), Spirox Corp. (TW-3055) , Genesis Genetic Asia (TW-4160) and FuBon Multimedia Technology Corp. (TW-8454)

Mr. Chen is known for his insight i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his 30 years experience in serving the industry, his strategic perspective always leads the industry growth. He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And he still dedicates himself in innovation till Today. He is one of very few industry leaders that possess cross-industry discipline ranging Software Technology, IT Services, System Integration and Internet Media services business.

Before founding GSP Corp. that focused in Online Video Advertising Operator business, Mr. Chen served as President & CEO, Systex Corp. (TW-6214) ; GM, Yahoo China & VP, Sales/Marketing Yahoo North Asia and also several senior management roles in US-based IT/Software and Services firms such as Novell, Oracle, Microsoft and IBM in Taiwan.

Mr. Chen earned his BS degree from Dept.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 Management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1978 – 1982) and also EMBA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89 – 1992)

Reiko Aoki

Professor,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Japan



Reiko Aoki is Professor at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Japan. She has conducted research and published on economics of patents, patent pools, standards, innova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academic journals such as *Journal of Economics, Management 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She currently is the principle investigator of several research projects such as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to Complemen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ation and Action](#)” at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and others funded by Japanese Society for Promotion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rade and Industry where she is a Faculty Fellow. She has been actively involved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since she served as an Executive Member of Counci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Japanese Cabinet Office 2009-2014. She has been involved in intergener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ssues through the Center for Intergenerational Studie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where she was a director. She received her Bachelor of Science (Mathematics) from University of Tokyo, Master of Arts (Public Policy) from University of Tsukuba, Master of Science (Statistics) and PhD (Economics)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have held positions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SUNY Stony Brook and University of Auckland.

穆榮平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



Mr. Mu Rongping received his B.S. and M.S. fro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Dr. Phil. from Technical University Berlin, Germany. Dr. Mu has been working at Institute of Policy and Management (IPM)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AS) since 1990. Professor Mu is now Director-General of CASIPM, founding director of CAS Center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CAS Center for IPR Research and Training, the Chief-editor of Journal of Science Research Management, and a member of sever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journals. Besides, he is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High-tech Industry Promotion Socie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of Science and S&T Policy Research, a member of the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Advisory Board of European Patent Office and Inter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f the Thailand S&T and Innovation Office since 2012. Dr. Mu has published some books concerning Technology Foresight and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nd more than 30 paper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Besides, he has drafted some policy documents concerning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building.

DoHoon Kim

President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KIET), South Korea



KIM, Do Hoon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Korea Institute for Industrial Economics and Trade (KIET), one of Korea's public economic think tanks. Before being appointed as President of KIET, he worked as director of several research divisions in KIET, such as Division of Current Survey and Forecasting, Division of Industrial Policy and Division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nd served as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spanning the years from 1979 through May 2013. He was detached from KIET to work for the OECD in Paris as principal administrator at the Trade Directorate between September 1997 and September 1999. He worked for RCIE at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as a visiting scholar.

He has been also members for many government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Six Decades of Kore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DI, December 2010" and "An Impact Analysis of the Korea-US FTA and Korea-EU FTA on Kore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KIET, December 2011".

PROFESSIONAL INTERESTS :

Trade Policies, Industrial Policies, Regulatory Reform

WORK EXPERIENCE

2013. May - Current	Present 19th President of KIET
2005. Nov. - 2006. July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 KIET
2004. Jun - 2005. Oct.	Director of Industrial Cooperation and Globalization Division, KIET
2003. Aug. - 2004. Jun	Director of Economic Survey and Forecasting Division, KIET
2000. Aug. - 2003. July	Director of Industrial Policy Division
1999. Sep. - 2013. April	Senior Research Fellow, KIET
1997. Sep. - 1999. Sep.	Principal Administrator, OECD Trade Directorate
1997. Feb. - 1997. April	Counselor to the Minister,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

1979. Feb. - Started to work at KIEI(now KIET)

ADVISORY ACTIVITIES

2013. May - Current Member of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orporate Partnership
2013. Feb. - Current President of EUSA KOREA
2012. April - Current President of Korea Society for Regulatory Studies
2004. Jan. - Current Member of FTA Civic Planning Committee
2004. Jan. - 2011. Aug. Member of FTA Civic Advisory Committe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2008. Feb. - 2011. Aug. Fair Trade Committee, Member of Market Structure Analysis Committee (Chairman)

六、GES 2014 台灣與談人講稿與參考資料

(一) The Future of Jobs

Chung-Ming Kuan

Minister,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Taiwan

Challenges to the future of jobs

The past three decades have seen a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landscape. Highly routine jobs such as production lines and bookkeeping are largely replaced by machines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Work that can be outsourced is shifted to places with lower production costs. Continuous progres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ccompanying with increased globalization, is intensifying the situation. We will see a world with more flexible, more collaborative and interconnecting but far less secure work in generations to come.

As a small and open economy, Taiwan is facing some particular trends that shape our future jobs. Demographic change toward an aged society and increased social diversity will have radical impacts on our workforce. Increasing virtualization and the need to co-develop with suppliers and customers for innovation will bring new business ecosystems, and change the whole work environment. To improve efficiency and precision while having declining number of heavy-duty workers, we are adopt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and will employ mor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obots. Companies prefer hiring more consultants and freelancers with variou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instead of traditional workers to deal with the ever-changing business demand. Zero-hours contracts under which the employees work and get paid only upon request may become a new norm in the job markets. To bridge the inequality gap between higher-skilled workers and low-skilled ones will become a critical challenge if we failed to change ou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Solutions

The future of jobs will be technology pervasive, more international and fluid. The jobs able to self-actualize and with much decent pay will require new values and more human touch.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disciplines, creativity, personal agility and adaptability, systematical thinking and knowledge of human salience become even more fundamental.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for cultivating those capabilities provides a supply of higher-skilled workers, and will then lead ever

greater job opportunities.

As a qualified workforce crucial to the decisions about where to locate jobs, companies are aware that quality control, product safety and protection to trade secrets are also big factors. Innovation-oriented companies will further choose places with superior network of good universities and b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ather than shipping jobs to low-wage countries. To attract these companies, governments have to set up complementary institutions like legal and monetary systems, and build up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network.

As the cost of start-ups is dropping rapid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one answer to the future of jobs will come from the companies that new entrepreneurs can create. To enable these rule breakers, it is substantial to have a friendly environment with deregulation and additional incentives on capital, talent attraction and company establishment. With vivid entrepreneurship and prosperous startups, there will be more non-routine jobs, jobs with high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jobs beyond our current imagination.

(二)New City Center in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Albert K. Ting

Chairman, CX Technology Corp., Taiwa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estimated that “by 2050 the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cities will have nearly doubled, from 3.6 billion in 2011 to more than 6 billion.” What is the right solution? And what is a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next “500 or more new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For centuries, urban settlements evolved slowly.” “But that era is over. Now as billions of people abandon subsistence farming for cities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pace of urban development make it essential for the private sector to drive the coordinated creation and expansion of new cities.” The 11-page article in the July-August 2013 edition o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explored various concept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end, John Macomber of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selected Phu My Hung (also known as Saigon South) project of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as a leading example. “The model of Phu My Hung, where thoughtful, long-term-oriented, private-sector actors help the world to create efficient water, power, and transit solutions, can-and must-be replicated.”

From Taiwan to Vietnam: “It Is Not Important What We Take Away, But It Is Important What We Leave Behind”

25 years ago when our company first went to Vietnam from Taiwan, Vietnam faced an inflation rate of 370%, high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sanctions such as a US led trade embargo. How to assist Vietnam in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mostly agrarian economy to a member of the world economic community where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drive growth was central to our minds. We devised a set of thre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transplant the Taiwanese economic growth experience to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Investing in Infrastructure to Jump Start Job Creation

Job creation was the initial focus to serve as a catalyst for growth. We introduced to Vietnam its first export oriented light industrial free-trade zone, Tan Thuan Export Processing Zone. From 1991, this joint venture with Ho Chi Minh City government has attracted 150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15 countries and generated 65,000 jobs for the local economy. Over time companies coming to our zone transitioned

from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textiles, toys, food processing to precision machine parts, automotive parts, electronic components and medical devices. The knowledge and skill content of workers hav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as industrialization progressed, Vietnam soon faced electricity shortage in the mid to late 1990s. 500 power outages a month in Ho Chi Minh City was not uncommon. To address this issue, we invested in the first 100% foreign owned power company in Vietnam, Hiep Phuoc Power Company. Our plant came on line in 1997/1998, just in time to help stabilize the electricity grid. Lights no longer flickered as our plant was connected to the national grid. Stable supply of electricity enabled the economy to continue to industrialize and to gener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Vietnam flourished in the process and stepped on to the world stage with its accession to WTO in 1997 and signing of 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n 2000.

Total export value from Tan Thuan reached US\$ 2.1 billion in 2013. Net export value reached half a billion USD, significantly bolster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of State Bank of Vietnam. Latest entries to Tan Thuan included multinational and local companies in the fields of semiconductor testing, I/C design, data center, on-line gaming, an engineering center and biotech.

Education, Key to Knowledge Based Urban Development

The final project of the trio infrastructure ensemble was a southward urban expansion plan for Ho Chi Minh City. In this joint venture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 we chose schools as the initial thrust to develop this new city center. The very first projects in Phu My Hung development were two schools: Saigon South People Founded School for Vietnamese nationals and Saigon South International School for children of foreign expatriates. Soon governments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set up their own consulate schools within Phu My Hung. In the nearby areas, Royal Melbourn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f Australia and Ton Duc Thang University of Vietnam then set up their campuses, as di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School, ABC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Renaissance International School. Most recently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pened in Phu My Hung. We also set up the non-profit Lawrence S. Ting School for Vietnamese students and it became the first school in Vietnam to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education partnership with Microsoft.

Virtuous Cycle to Help Creating a New Middle Class

From a piece of swamp land with no road access, no water nor electricity, the Phu My Hung development grew as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hospitals, shopping mall, trade and exhibition center, office towers were developed. Following the master plan, each new development addresses a new need within the urban fabric and reinforces previous ones. Today 50,000 people from 40 countries live in our city center area. Approximately 10,000 service sector jobs have been generated as 40 bank offices, hundreds of restaurants and shop fronts opened. Multinational such as Manulife and Unilever, and locally companies such as Vinamilk and FBNC cable television financial news channel also relocated their corporate headquarters to Phu My Hung. As more and more service sector jobs are created, local entrepreneurs starte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chools for working adults in foreign languages, comput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skills. A constant exchange of new ideas and concepts by people living and working in Phu My Hung is beginning to generate more innovation and growth. Nearby neighborhoods have also been transformed as we share our best practices with others. Most importantly, since local Vietnamese own nearly all residential units, a new middle class has emerged as they see the value of their housing stock appreciated over tim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Projec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We have operated under the motto of “it is not important what we take away, but it is important what we leave behind.” How to inspire our residents to do the same and contribute more to the society was a question that we began to work on in the last 10 years. The answer we found was frequent engagements and participation. 8 years ago we began with the first Lawrence S. Ting Memorial Charity Walk, a 4 km walk in memory of our company founder that raises money for the poor each year before Tet, the lunar New Year. 3,000 people came and joined the walk the first year, then 5,000 the next year, 8,000 the following year.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grew to 13,000 to 15,000 people in the last 5 years. We work with Canadian Consulate General to help host its annual Terry Fox Run for cancer in Phu My Hung. We partner with British Business Group and a British NGO to host BBGV Annual Charity Run and Saigon Cyclo Challenge respectively. We work with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for its Walk for Environment, with Samsung for its Hope Relay, and with the Ministry of Labor, Invalids and Social Affairs for its Charity Walk for the Disabled. Each year we help host a memorial concert for Vietnamese musician Trinh Cong Son. Our annual Children’s Day and Spring Flower Shows are typically attended by nearly 12,000 people and half of million people respectively. During these events we would often ask people to take a minute out their busy schedules and think

if there is somewhere in the society that they can be helpful.

Creating a Sustainable, Knowledge-based New City Center

In the last 25 years, with job creation,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s, we have, with the assistance and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 of Vietnam, build a new urban center as part of Ho Chi Minh City. We have increased the knowledge content of products produced in the area, increased the skill set of workers in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sectors, fostered the growth of leading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nd facilitated hard working Vietnamese nationals to create a bet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he city center has transformed from a collection of inorganic buildings to a self-guiding sustainable organic community that will continue to grow and prosper. Our work thus far is rather limited in comparison to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that our Vietnamese residents and partners will create and innovate as time goes on.

(三) Integration and Experience Exchange of Resource Recovery System

Jyh-Shing Yang, Ph.D.

Senior Director, Center of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nd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Taiwan

- Global exchange of good practices for resource recovery based on local lifestyle, such as cascade usage, integrated green design, cross-boarder cooperation and properly designed indicators will bring us to a better 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world.

The resource recovery of post consumer goods had been elevat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etal and economical issue in many countries after the global resource shortage and price skyrocketing for almost a decade. Meanwhile, the resource recovery policies implemented in EU and other countries since 1990 already provided us handful practical tools, such as policy guidelines, market practices,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channels for new applications of recycled materials. Unfortunately, the im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effect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still exist i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n resource recovery and utilization systems were established. We have to adopt systematic and innovative planning based on some existing good practices to jeopardize the synergy effect of resource recovery.

Problem faced:

Usually, the successfulness and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recovery system always hindered by some key problems and issues as the following:

- Most of the sources of recyclable subjects are geographically too scattering. Therefore, the resource recovery system has to be integrated with some other existing system, such as local garbage collec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minimum quantity for financially feasible operation.
- The value of some recyclable materials, such as packages for foods, is usually too low to be collected in a self-sustainable way. Therefore, the support of environmental consciousness from consumers and the enforcement of governmental policies are key success factors constantly. Usually, the system designed base on culture and local lifestyle will be sustained longer.
- The cross containments of recyclable materials is very difficult to be controlled and monitored. Usually, introducing 5% of polluted matters will ruin the whole recycling system. Therefore, the measures of pre-management and separation

prior collection will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he recovery system.

- The basic properties of targets goods will affect the cost and designated usage of recycled material. For example, steel materials can be smelted and regenerated easily, while plastics have to be segregated into thermoplastic and thermosetting in order to decide the most proper way of regeneration and further usage.

Suggestions:

- **Promote the cascade usage of all materials.** Many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of consumer product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purity and formulated blend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suitable usage. Therefore, it is economical and societal viable way to build the CASCADE usage roadmap of some valuable materials to extend the life cycle benefits. For example, the plastic used in mobile phones can be recycled and used in general industrial products and further to be cascaded to next step of making plastic furniture.
- **Integrate the product design with resource recycle.** Proper industrial design will intensify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source recycle and regeneration ratio. For example, increasing the percentage of polypropylene (PP) used in cars, replacing the compound plastics with single plastics, will always increase the system efficiency of the resource recycle system. Therefore, “Extended Producer’s Responsibility” policies shall be promoted and creating the economical and social pressure to enable all producers to put more efforts on green design.
-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recycle and regeneration.** Usually, many recyclable products will need the volume from many countries to meet a threshold of large quantity (i.e., a market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to enable the installation of an efficient regeneration plant in an economical scale.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the recycle of precious metals.) However, the control of waste-dumping and the pollution abatement shall be treated as the highest priority before we can have som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on recycling.
- **The recovery ratio shall be used for the support of system efficiency instead of the sole management goal.**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resource recovery ratio in som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has been the obstacles for the maximization of system efficiency. For example, the required 75% of recovery ratio of some ICT products in EU enforced the manual separation and recovery of many small components from mobile phones. This will increase the total cost dramatically comparing with the alternative way of co-generation of the valuable metals in copper smelters.

Conclusions

Recovery, regeneration and reuse are three most important pillars for the resource recovery efficiency. We shall collect and promote those innovative and successful systems developed in many countrie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cooperative platform and experience exchange can bring us to the ultimate goals of global 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七、「GES 2014」大會活動照片



